

“保元风云”穿越“汉阳兵工厂”

每当华灯初上，保元里大门，年轻的身影纷然闪现，参与《保元风云》沉浸式体验，扮演一个角色，融入剧情发展。

时光之幕拉回到武汉解放前夕，1949年5月15日夜，保元里9号窗幔严实，悄然来了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宣传部长张文澄，凭着一部电话，指挥390多名地下党员迎接江城黎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演绎为跌宕起伏的情景剧，老里份不只是低吟风花雪月，而是叱咤风云雷电。

保元里，地处南京路旁保华街，1912年民国元年始建，得名取自时空两个元素。这里闹中取静，湖北省银行租用几栋作为高级职员公寓，9号小楼入住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童璋。童璋之子童式一在上海加入地下党，1947年派回武汉任文化新闻小组副组长。他借用父亲的名望，依托保元里的环境，在家中设立华中经济通讯社掩护工作，职员全为地下党员，曾惇和组织部长陈克东也用化名聘为主笔，潜伏在敌人心脏秘密战斗。

2024年春，保元里修缮一新开街，定位“历史潮流创意街区”，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保元风云》活化红色资源，再现历史场景，让故事流动起来，让观众参与进来，颇受时尚一族青睐，也带来电影《保元里9号》跟进开机。

江北这边《保元风云》热演，江南那边《穿越·汉阳兵工厂》走红，场景转换为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后者利用辛亥革命博物院的多功能展厅，重现汉阳兵工厂紧急撤离重要设备的时刻，与日军争分夺秒。它采用“剧情引导+自主探索”的双线叙事模式，集成空间定位、动作捕捉、多人联机、地形自适应等跨界技术，只需穿戴VR设备，立马开始硝烟弥漫的战场之旅。

《保元风云》实景演出，《穿越·汉阳兵工厂》虚拟空间，突破“静态展陈”的聊以怀旧，营造“动态体验”的新奇时尚，将传播对象植入其间，城市脉搏灵动可感。

在武汉，“穿越”之前曾有“遇见”。两年前，省博推出沉浸式全息剧《遇见·楚庄王》，借助元宇宙技术，让文物承载的历史，通过系列剧方式呈现。今年春节，《穿越青铜纪》又应运而生，游客戴上VR头盔，就可亲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烈恢宏。这个夏天，长江游船沉浸式情景剧《满江红·岳飞》升级，每天落日时分从汉阳门码头启航，游客在滔滔夜色中化身“岳家军”，重温“还我山河”的金戈铁马。

城市不缺人文资源，缺的是活化人文资源。从“静态展陈”到“动态交互”，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一旦与人共舞，定然活力无限。

挥别保元里，一眼瞥见《保元风云》屏幕下，跳跃一行小字“汉口焕新，不止保元”……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保元风云”穿越“汉阳兵工厂”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75，武汉地质学院扎根江城 / 谌达军

风雨同舟

<<< <

10 “怪刀杨”的翰墨情怀 / 杨贤毅

九城同心

<<< <

14 蕲艾青烟袅千年 / 张月生

委员天地

<<< <

19 一名海归委员的家乡答卷 / 周恩来

22 为孩子的“童心”而坚守 / 陶双珍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25 三次转折探路 “暖通” 向新而行 / 赵 铿

烽火江城



29 大别烽烟（上）——“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七 / 涂文学

36 汉口申新四厂内迁宝鸡 / 刘 磊

人物述林



41 “茅盾”笔名取自武汉革命经历 / 侯红志

45 湖北“革大”第一期学员杨玉麟 / 杨树德

49 张之洞的玉石字画逸闻 / 方 宏

都市寻踪



52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合影名单考 / 田联申

55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下） / 董玉梅

60 归元禅寺翠微古池 / 韩少斌

往事漫忆



63 大成路琐记 / 陈德刚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1975，武汉地质学院扎根江城

◇ 谌达军

轮印：1975年，北京地质学院落户武汉，在南望山下艰苦创业，扎根江城50年，成长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天大树。

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于新中国百废待兴之初，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建。

1970年，鉴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北京地质学院奉命外迁，初定湖北江陵。然而，江陵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分散办学难以为继，北京地质学院老院长高元贵力陈江陵非久居之地，地质教育需要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坚实的依托。

1974年夏，湖北省委同意在武汉市区选址。选校小组踏遍武汉三镇，反复勘察比较。最终，毗邻东湖、背靠南望山与喻家山、邻近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鲁磨路两旁地段，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潜力，一锤定音为新校址。这一决策，为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今年，时值北京地质学院落户武汉50周年，采访和梳理当年亲历者的口述回忆，重温那段火热创业的奋斗历程。

武汉有多大，地质学院就有多大

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石教研室副主任、区域研究所所长的游振东教授，对迁校过程记忆犹新。

1970年，北京的一些高校开始外迁，北京地质学院自不例外，好像先是准备迁往湖南石门，后又改为湖北江陵，校名也改为“湖北地质学院”。1972年，高元贵老院长担任校革委会主任，在原武汉地质学校成立“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开始招生，本院还在北京。1974年，湖北方面决定校址定在武汉，并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1975年夏，在北京的教职员工全部迁往武汉，遇上河南发大水，京汉线被大水冲断。不久铁路通车，铁道部安排一趟专列，把大家运到武汉，坐的是一趟绿皮车。



1974年春，测制新校地形

为了迁校，家家户户都作了详尽安排。首先是户口问题，自己都上交户口本了，学校又考虑将来，将户口本退了回来。其次是子女问题，将两个孩子留在北京读小学，学校专门组织教师来管理这批“寄读班”孩子。吃饭有学校食堂，孩子们过着独立生活，还蛮高兴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勘探教研室李紫英教授回忆说，1975年8月正值夏秋之交，大家告别生活20多年的北京地质学院，搬运家当，扶老携幼，乘上北京到武昌的专列。她把年幼的两个孩子及刚从农村老家接来的老姐姐暂留北京，心里空荡荡的，不时到车厢的洗脸间偷偷擦拭眼泪。但一到武汉，和丈夫一起全力投入办学。

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水文地质教研室主任的梁定伟回忆，1975年到武汉，简陋拥挤的居住条件，是大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他们一拨安置在武汉地质学校，入住学生宿舍的筒子楼，一家四口12平方米大小，两家共用一间杂物房。做饭的煤火炉放在门边的走廊过道上，每到做饭时间，锅灶连成一片的情景显得非常热闹，可谓一道难得的风景。武汉还在酷暑中，筒子楼内

更觉炎热难耐，各家各户连一台电扇也没有，想冲个澡也无处可觅，似乎人人在不知不觉中练就了抗酷暑的本领。这一批到汉不久的北京人，也学会了武汉居民夏日纳凉的方式，每到晚上，各家将床板搬到空旷地露宿，倒也有一番情趣。

学院采取“边迁、边建、边招生、边办学”的办法，教职员工到武汉后，唯一能够落脚的地点，就是汉口宝丰路的地质学校。但那里地方不太大，原地质学校的教职工还住在那里，于是又向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湖北省委党校、在武昌胭脂路的湖北教师进修学院和狮子山上的华中农学院借了一些房子，加上正在兴建的南望山新校区也住了一部分人，形成了“五点办学”的局面。党委书记王焕在北京做外迁武汉动员报告时说，“我们大家熟悉五道口（注：北京地名），那边有四道口”。实际上，武汉也是“五道口”。

由此，老师们戏称“武汉有多大，地质学院就有多大”，上课在五个教学点之间来回奔波。

李紫英说，勘探系教师分配住到华中农学院的学生宿舍，每户12平方米安家。



1975年春，建起新校“第一房”

丈夫在地质系讲构造课，每天必须早出晚归，分头到地质学校、进修学院上课，汉口、武昌两头跑，遇到的困难难以言表。但是，作为一位中年教师更渴望走向讲台授业解惑，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以教学科研为乐。

李紫英记得，勘探教研室数学地质小组由赵鹏大老师领导，为金属专业的三年级学生，首次开课《地质勘探中的统计分析》（即通称的数学地质）。为了辅导好这一门新课，大家战酷暑、冒严寒，骑自行车到华师、武汉大学旁听《概率论》《数理统计》课程。赵老师开课后单课独进，每周24学时讲课、12学时的实习课，加上答疑、辅导、考试，持续近两个月，大大增强了教学连续作战的能力。

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系岩石教研室主任的王方正也记得，从北京到武汉后，所在的地质系大本营住在进修学院，上课地点分别在华农、武汉地校及湖北省委党校。早晨一般5点起床，吃完早饭背上标本和教具，搭乘早班公交车，先后赶往三处，下午上完课再乘车回进修学院。这种“游击队式教学”，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新校初步建成才完全结束。

在南望山下拓荒建校

1975年，对于武汉地质学院而言，是扎根江城开启新篇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在武昌南望山与喻家山南麓的荒坡野岭之间，一群地质教育工作者和建设者，用信念与汗水，拉开了在汉建校的序幕。



师生共建校园

初春寒意未消，肩负重任的基建办公室，在主任刘普仑带领下，叶俊林、赵兰雄、任宝汉、许登仕等副主任及基建人员，满怀憧憬又带着几分凝重，踏上了这片未来的校园——农田、村舍和起伏的丘陵。由于仅有一个小村，周边又无房可租，基建队伍只得暂时栖身于邻近的华中工学院，借住的两栋小楼成了建校指挥部。

没有现成的作业场地，就自己动手创造。基建人员不等不靠，挥锹夯土，紧邻华工围墙，硬是建起了一个大型汽车棚，解决了施工车辆的停放问题。

征购土地的工作同步启动，叶俊林与王定域老师肩负重任，奔走协调，艰难完成了首期203亩土地的征购。与此同时，测量教研室的李汝昌、王祖英、吴焕仁等9位老师，扛起仪器顶风冒雨，走遍校区及后山区域，在荆棘丛生中开展实地测绘。白天野外作业，夜晚整理数据，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约1000亩范围的1:1000地形图，为后续规划设计提供了精准的“蓝图”。

在东区山坡下，场地平整随即展开。基建人员清理杂草碎石，平整出堆料场，搭建起临时工棚。入秋至冬，发扬“自己动手，



南望山、喻家山下的原始地貌

丰衣足食”的精神，陆续建起了工地食堂、浴室、仓库和办公用房，架设了高压输电线。

尤为不易的是，将原本计划在江陵建校时积存的上千方木料，通过自己的汽车队，一车车长途跋涉运抵武汉校区。砖瓦灰沙石等建材的采购和装卸，大多由基建人员承担。沉重的砖石压在肩头，汗水浸透衣衫，成为那段拓荒岁月最真实的注脚。

湖北省建委将校区的设计重任，交给了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由总设计师李舜华担纲。为满足武汉美化市容和节约用地的要求，最初的规划设想颇具“雄心”：以鲁磨路为界，在西区主教学区建造一栋高达20层、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综合教学实验大楼，在东区沿鲁磨路密集排列8栋点式住宅楼，二者相互呼应。

这一方案，在校内引发激烈的讨论。以基建办和校领导为代表的一方认为，20层高楼虽然壮观，但建设周期长、造价高，远超学校财力；更关键的是，将众多功能各异、精密程度不同的实验室（特别是地质类实验室常需重型设备、防震、特殊通风排水等），垂直叠加在一栋高楼内，极易相互干扰，极不利于教学科研活动和学生安全。同时，沿主干道布局点式住宅，噪音和粉尘污染也影响教职员工的休息和生活质量。经过反复磋商并联合施工单位，校方以当时

技术能力不足为由据理力争，最终说服设计院和主管部门，采纳了更为务实的方案，采用分散布局、多层为主的建筑群模式，并将教职员员工住宅区在校园内部规划，远离主干道。这一决策，体现了地质人尊

重科学、讲求实效的作风，确保了后续建设的可行性和校区功能的合理性。

基建办副主任任宝汉是1946年参军的老革命，转业到北京地质学院膳食科工作后，就是一名老模范。在工地，任宝汉主管建材进出，身先士卒如同装卸工。运料车一到，常见他带头或独自卸货，直到汗流浹背才去吃饭。工地上散乱的建材，总是被他默默清理归整。更令人动容的是，自到工地起，每年春节他都主动留守值班，放弃探亲假成全同事，被师生们尊称“老黄牛”。遗憾的是，长期的过度劳累最终将他击倒，罹患急性尿毒症，1981年秋不幸离世。

从自制标本起步办学

梁定伟回忆说，刚迁来武汉，为贯彻“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的精神，学校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培养急需的地质人才。在借住的几个教学点，教师穿梭来往授课，不管严寒酷暑，坐着由卡车简单装备的交通工具就出发。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学资源缺乏。旧的资料，有的不符合新发展的要求，有的在搬迁中不慎丢失。同时，培养目标、发展计划需要重新制定，教学大纲、教材需要重新编写。没有现成的，一切又十分紧迫。梁



1979级新生开学典礼

定伟负责讲授水力学及地下水动力学，基本状况就属于此，不得不加班加点编写讲义，最后以油印的形式发给学生，做到了“课前到手”（上课提前把讲义发到学生手里）。

梁定伟说，工农兵学员学习热情很高，学习非常努力，可由于文化基础特别是数理化基础较差，对专业课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这是教师共同遇到的又一难题。他所讲授的课程，涉及数理化基础更多一些，于是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注意突出实用性，重点掌握应用性，讲解原理采取后续慢步跟进、难点多次反复、课后辅导答疑等方式，让大家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基本技能目标。另外，对少数数理化基础特别差的学员，单独在课余时间“开小灶”，帮助他们补习相应的知识，跟上教学进度。

王方正回忆，图书资料和标本仪器也特别缺乏，老师们设法四处寻找。大家发现，湖北省地矿局图书馆的地质类图书和期刊较为丰富，甚至一些国际学术期刊，即使在“文革”运动中也没断档，成了地质专业教师学习国外新理论、新技术的好去处。一般去汉口教学点上课，就抽空到这个图书馆查

阅资料，从中获益良多。此外，老师们在野外教学实习及科研时，自觉注意收集各类标本，以补充教学标本的贫乏，很多一直到现在都能使用。

李紫英回忆，教学科研设备先期没有经费，课堂上挂的全是自己动手画的图表。后来有了点经费，也是用于制作幻灯片及投影胶片。第一笔科研经费是200元周转现金，用完后到拨款单位实报实销。后来承担部级攻关项目或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平均经费也只有10万元左右。上“宁芜项目”时，每人一把大小不等的计算尺，全组一个手摇计算机。她记得，小儿子做小学算术作业，有时偷偷动用手摇计算机，她发现后制止多次，干脆把它藏了起来，生怕用坏了。

后来，项目组有机会到中科院计算所学习大型计算机。为了省钱，总是安排在夜里2—4点上机，多数时间是纸带穿孔和修理纸带，一盘盘的程序和数数据黑纸带，像宝贝一样珍藏。到1980年代初上“铜陵项目”，终于用上了卡片输入的大型160机，野外工作时每人有了一个小计算器。好几年后，才得到一个PC-1500。

从北京地质学院到武汉地质学院，基本就是这样“白手起家”，一步步走过来。



学生在新教室上课

向珠峰月宫发起冲锋

1987年，武汉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两地办学，总部在武汉。2005年，武汉、北京两地独立办学。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东校区，有一座名为“四方印”的新建筑，校史馆就在其中。馆内，在“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校训下，一群师生铜像引人注目。他们身着冲锋衣，手拿地图、铁锤、探测器，脸上洋溢着“发现宝藏”的欣喜。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藏品，将地大人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奋斗岁月徐徐展开：

2022年10月26日，浙江长兴煤山“金钉子”剖面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将这枚“金钉子”钉在中国的，正是“全国最美教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从1960年代开始，殷鸿福及其团队就在石头里寻找蛛丝马迹，通过古生物来确定地质年代，将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开创了一门系统科学“古生物地质学”。

如今，殷鸿福的弟子谢树成院士接棒研究，重点攻关地质微生物领域，带领团队依靠独特分子式和同位素水平进行探索，取

得了系列创新性研究，中国因此被国际著名学者誉为“发展地球生物学的一支国际领导力量”。

最近，在行星科学研究所所长肖龙的办公室，放得最多的就是各种模拟月壤。2009年，作为嫦娥五号工程深度参与者之一，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开启模拟月壤研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收集土壤样本，用有限的陨石和遥感数据反复分析，经历上千次失败的实验，配比出10多种共100多吨模拟月壤。嫦娥五号在月球上“抓了一大把土”回来，让地大人对月球距今30亿年以来的演化历史不断产生新知。

2012年5月19日上午8时16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校女大学生陈晨，作为唯一女性与三名队友共同登上珠峰，成为我国首位问鼎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

2022年4月30日上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陈刚，与儿子陈李昊一起成功登上珠峰，父子携手站立在地球之巅。

攀登珠峰，是地大人特殊的“璀璨光荣之路”。中国地质大学为国家培养了7000多名登山人才，撑起了中国登山界的一半。

登顶后，陈晨说：“人的一生要遇见很多座山，有高有低，但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攀登，再攀登。”

在勇攀珠峰精神的鼓励下，由武汉地质学院发展而来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将不断勇往直前攀登新高峰。

谌达军，长江日报高校新闻中心主任，
主任记者

“怪刀杨”的翰墨情怀

◇ 杨贤毅

人物名片：杨贤毅，民进会员，湖北开明画院副院长、湖北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双钩书法”代表性传承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72年，那时我4岁，还住在武昌水陆街的老房子里。有个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小姐姐，经常在附近的花坛边用毛笔描红写字，时而点横、时而竖撇、时而弯钩……我看得眼花缭乱，非常好奇，专注地欣赏着勾画出来的线条美。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轻声问：“姐姐，能不能把你的笔借给我，让我也来画一下，行不行呀？”小女孩看了看我那双期盼的眼

神，想了一会，把手中的笔递给了我。我小心地接过笔，学着小姐姐的模样画了一下。就这么一画，从此爱上了写字，对写字产生了兴趣。

小时候我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多余的钱买纸买笔，只能眼巴巴地站在小姐姐旁边观看，偶尔蹭个一笔两画的。有天我在花坛里捡到一支小姐姐丢弃的旧毛笔，高兴坏了，飞快跑回家，蘸着水就在水泥地上写画起来，直到将毛笔写秃了。

我爷爷深谙书法之道，在我的恳切请求下，爷爷拿出珍藏的字帖，耐心教导我临摹，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书法之路漫长而枯燥，唯有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自此，深夜的灯光下，常常能看到我专注练字的身影，从不停歇的坚持，让我笔下的字渐渐有了韵味。

1989年，我考入湖北省书画艺术专修学院书法系，得到多位书法名家的悉心传授，我的书法技艺突飞猛进，坚定了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念。

获“怪刀杨”雅号

1998年，我受到电脑刻字的启发，心想能不能以刀代笔，在不量尺码、不打底稿的前提下用刀把字刻出来呢？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我独创了“刀刻书法”。2004年3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看到我表演的“刀刻书法”后，对我说道：“您的项目在现有记录范围内尚无人能及。”

用刀刻字，需要掌握精准的力度，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分毫不差，使刻出来的字像写出来的字一样苍劲有力。刻字的刀很锋利，有一次不小心划破了左手拇指，到医院缝了5针，现在还留有很深的疤痕。

为了练习“刀刻书法”这门绝活，我曾在家中的镜子上刻，在彩色电视机屏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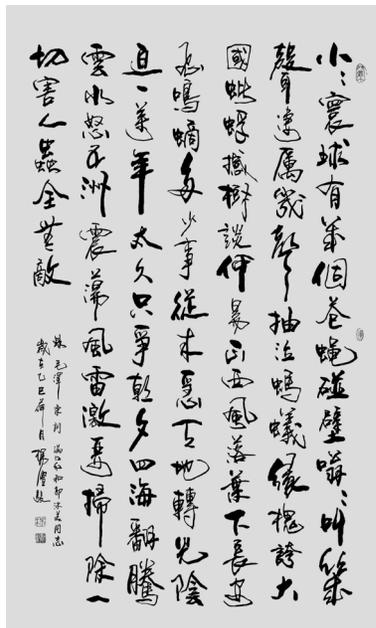
刻，包括在气球和豆腐上刻，后来还尝试在人体的手腕甚至脸上刻，我女儿和多位体验者都接受了这样的“冒险”，至今无一例失手伤损案例。

练好“刀刻书法”，必须要有过硬的书法功底，熟悉掌握历代碑帖的书写笔法及字形结构，形成“数字化”概念，同时要掌握篆刻以及章法的布局和技巧。在刀刻书法过程中，要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手中的刻刀，使刻刀力度恰到好处，过重或者过轻都会影响书法效果。

以刀带笔，先得会用笔。我的刀刻书法绝活，源于对书法的痴迷。我还独创了“单刀割纸”“闭目撕窗花”“书法半边字”等技艺。凭借这些艺术成就，我荣获“江城八怪”之一的“怪刀杨”雅号。

2014年1月，我应邀到武昌区千家街小学展示“双钩书法”技艺。现场“双钩”了一个巨幅“福”字，祝福该校师生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寒假和马年春节。这个“福”字尺幅为25米×25米，占了学校操场几乎一半的位置。事先，师生们把粉红纸张在场地上铺连粘贴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我不量尺码、不打底稿在铺好的纸张上徒手书写。这个“福”字，老师站在五楼用广角相机都拍不下来，最后是用无人机航拍完成的。

为弘扬书法艺术，2008年，我主编的《好学快用毛笔填廓本》（一套六本）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书法入门指导用书”，2010年升级再版，公开发行。2012年，我的“创意浮雕书法”“双钩字创意书法”“刀刻书法”在湖北省版权局注册。



书法作品



双钩书法作品



在武昌区千家街小学操场徒手书写巨幅双钩书法“福”字

2009年，我荣获由中国国防电视宣传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教科文卫事业促进会、中国艺术与科学联合会、中国教育事业促进会联合颁发的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优秀指导教师奖”。

传统文化不能丢

我有很多担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但精神文化生活却没有跟上脚步。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快餐”经济引领潮流的时代，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研习传统文化。孩子没有民族文化铺垫引导，就好像无源之水，传统文化若在这一代流失，后果不堪设想。

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的娱乐方式变得多元化，选择传统书法作为课外兴趣的越来越少，许多年轻人“提笔忘字”；孩子们鉴别能力有限，网络游戏霸占了他们大量的课余时间，加上社会发展倡导环保和无纸化办公，他们拿笔的机会更少了。为此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各个场合大力呼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重视键盘的同时也不要忽视手中笔，切莫让民族文化精髓在我们这一代流失。

为了更好地弘扬、传习书法文化，2004年11月，我开办“穆逸文化艺术培训中心”，第一个培训班在武昌水陆街小学招收50多名学生。别的小孩参加书法培训班，是被家长强迫拖着去的，来我这学习的小朋友则是主动要求的。我办班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材料费，对我来说，经济效益不是主要的，真正目的是要挑选一些喜欢书法的好苗子，传承中国的书法艺术。

当然，奢望孩子们立竿见影学会书法并不现实，我只是希望他们先了解书法，然后喜欢书法，爱上书法。如果能碰到有潜质的孩子，我乐意倾其所有地传授。

这以后，有很多学校邀请我去任教。现在，我除了在家里痴迷钻研书法艺术之外，还要到一些高校和中小学教授书法，并对在校老师进行传统文化培训。

教书就像种花一样，需要浇水、施肥，整个过程一步都不能怠慢，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如今看到学生取得好成绩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觉得再忙再累都值。这些年，我有多名学生在国际、国内青少年书法比赛



荣获民进武汉市委会2024年度“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中获奖。孩子们学有所成，家长送来各种锦旗，让我非常欣慰。

比起孩子们获奖，我更看重的是“德艺双修”，我经常教导孩子们学练书法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品。因为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书法即人品。正所谓“字如其人”。明代文化名流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就说：“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所以闲圣道也。”

我最喜欢的人生格言就是“厚德载物”，我也是自觉身体力行。1998年夏季，武汉遭遇特大洪水灾害。我当时立下“生死状”，连日开车运石沙抢堵决堤险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冒着病毒感染的危险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坚定守护市民平安。

用笔毫点燃温暖

每年春节前夕，我都会带领“爱心小分队”，走进部队、学校和社区，义务为大家书写春联。活动现场，居民们被我们的爱心所感染，纷纷主动帮忙裁纸、添墨，温馨和谐的氛围洋溢其中。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明白奉献的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书法技艺方面，除了传统书法，双钩书法、刀刻书法、浮雕书法、书法半边字、字中字和鸳鸯书法均属于我个人在书法领域的革故鼎新，另外篆刻、瓷刻则属于在书法工艺品领域的跨界。而我的单刀割纸、闭目撕窗花等接地气、贴近生活的技艺表演，又是将书法文化提升到艺术性与趣味性、观赏性与挑战性并存的境界。所以我也会适当参加商业性的表演，我的目的是“赚钱”但又不是为给自己“赚钱”。作为“武汉好



海外文化交流活动掠影

人圈”的一员，我经常慷慨解囊，对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援助接济。凭借商演赚的钱最后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捐出去，“以商养善”。

2018年8月，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更大了。我积极参与民进市委和武昌区工委开展的调研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关注反映民生问题，帮助调解社会矛盾，取得良好社会反响。2019年，我被市委评为参政议政优秀会员，撰写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建议》，作为市民进在市政协大会上的集体提案得到采纳。

从小书法就陪伴着我，我也对书法不离不弃。我把书法定义为无形的翅膀，我的人生因书法而振翅高飞。

我认为，人空空地来到世界，但有价值的生命不会空空地走。“鸟过留声，人过留名”，是我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激励。我希望凭自己的一笔之功力在社会上留下更多的精彩，同时用这精彩回敬生我养我的故乡和祖国！

蕪艾青烟裊千年

◇ 张月生

在华夏本草的璀璨星河中，艾草这颗古老的星辰已闪耀五千年。它曾以“冰台”之名，承载着先民“削冰引火”的古老智慧；也被称为“医草”或“灸草”，其芬芳浸润着杏林济世的仁心仁术。

后来，艾草沿长江传播，扎根于荆楚大地的蕪春。这片沃土得天独厚，孕育的艾草得天地灵气滋养。更因“药圣”李时珍的慧眼识珠，使其独享“蕪艾”之誉。自此，这一缕青烟，不仅缠绕着千年的本草传奇，也升腾起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的见证。

艾草的应用智慧

艾草的应用史，是一部凝聚先民智慧的实践史，其使用可追溯至五千年前。远古

时代，先民“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绒承其影，则火生”，此即“冰台取火”，艾草亦因此得名“冰台”。

利用冰块球面凸透镜聚光取火，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此技不仅展现了先民对光学原理的朴素运用，更成为保管火种的关键。在氏族社会中，专职保管火种的“火神官”或“祝融”，需常采摘艾叶晒干制成艾绒，用以取火与延续火种。

艾草在古人生存实践中亦大显身手。古人行军或穿越沙漠，常携艾草以寻水源：于沙中掘坑燃艾，观察四周，凡有气体升腾处，下挖多可得水。其原理在于“山泽通气”，燃烧艾草可助辨别大气中微量水汽，寻觅数里外的水源草地。

早在西周时期，《诗经》便以“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记录了先民采摘艾草的身影，此时艾草主要用作祭祀之物。至战国时期，其药用价值已被深入认识和应用，《孟子》更提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强调陈年艾草治疗顽疾的独特功效。屈原《离骚》亦云“户服艾以盈要兮”，足见其知名度之高。

面对疾病与瘟疫的侵袭，先民在无数次观察和实践中发现，负责保管火种者及其近邻常能在瘟疫中幸免。究其缘由，乃其居所墙壁常挂满艾叶。由此，“艾叶辟邪”渐成共识。

端午节“悬艾避邪”习俗自晋代形成，宋代盛行。民谚“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即源于此。古人将艾草与菖蒲结扎悬挂门楣，配雄黄、苍术制香药，驱虫散浊。这一传统实为借助艾草挥发油杀菌特性，在春夏之交流行病高发期进行集体防疫。端午节也因此有“艾节”之别称。

“艾叶辟邪”之说虽曾被视作迷信，然现代医学揭示其科学内核：艾叶的主要挥发性成分，对多种致病细菌及病毒确有显著抑制或杀灭作用。研究表明，艾香能有效杀灭或抑制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等多种病原体，并对流感病毒（尤其甲型）、铜绿假单胞菌等有抑制作用，用于空气消毒可显著降低流感发生率。

艾草除了用于治病，还是一种不错的食材。唐代《食疗本草》首次系统记载艾草食疗方：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作馄饨如弹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长服止冷痢。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衍生出艾叶青团、艾糕、艾酒等养生食品，兼具温经散寒与营养滋补之效。

本草明珠“蕲艾”

蕲春，地处长江中下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境内低山丘陵交错，气候冬冷夏热，雨量充沛，适宜于多种中药材生长。《本草纲目》记载的1892种药物中，见诸于蕲春的就700多种。蕲艾，特指蕲春所产的艾草。

蕲春的蕲艾植株高大，高1.5—2.5米，香气浓烈；叶厚纸质，被毛密而厚，中部叶羽状浅裂，上部叶通常不分裂，椭圆形或长椭圆形，最长可达7—8厘米，宽1.5厘米，叶揉之常成棉絮状。蕲艾制作的艾条，在燃烧时释放出的热量比其他产地艾叶制作的艾条要高，热力渗透性强。

相传朱元璋兵败蕲春，腰疾复发。老乡医用艾叶水煮，先给朱元璋腰痛处蘸蒸，后用煮过的艾叶带水在腰伤处揉搓。随后，又用生姜、食盐、黄酒炒熟，用荷叶包着制成布袋，裹在腰痛处。朱元璋顿感腰部一阵轻松，连说：“蕲艾真神！”不足半月，他的腰疾就被蕲艾治愈。朱元璋后来东进，每次途经“三斗河”渡口，都要顺便看望老乡医，还拔出军银修复“三斗桥”。“三斗桥”



蕲春艾草

也就从此改名为“三渡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

蕲艾的医药价值尤为卓著。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曾著《蕲艾传》一卷，称赞艾叶“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此书可能是第一本专门论述艾叶的专著，惜已失传。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其定名：“艾叶本草不著土产，但云生田野……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今蕲春）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并高度评价蕲艾“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异也”，精准道出其精油含量高、穿透力强、灸效卓著的特性。明弘治年间（1488—1505），太医刘文泰著《本草品汇精要》中正式提出，确定蕲艾为道地药材，“艾生田野，今处处有之……道地，蕲州”。历代医籍转载，蕲艾名扬四海，明代更列为贡品。

现代的一些医药专著也均强调蕲艾的优质性和道地性。如1953年，时逸人著《中国药理学》就注明：“艾产于我国各地，以湖北蕲春县最佳”。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现代中药的大型志书《中药志》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本草药性大辞典》等也多有类似记载。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蕲艾作为道地药材，其挥发油及微量元素含量显著优于他处所产。挥发油含量普遍高出全国各地两倍以上，总黄酮含量（可达14.67%）、鞣酸含量（13.29%）也显著高于其他产地。其燃烧值亦高出20%以上。微量元素如Mg、Ca、Mn等与理血作用相关的元素含量较高。



蕲春李时珍纪念馆

在抗菌、抗炎、抗过敏、镇痛、镇咳、平喘、祛痰、抗肝纤维化、抗疲劳、增加免疫力等方面，蕲艾均表现出更优的药理作用。这些科学数据印证了历代本草对蕲艾道地性的推崇。

蕲艾更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宋代即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之俗。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门悬艾叶与菖蒲，配以雄黄、苍术等制成香药，驱虫散浊。“香包襟上带，娃娃逗人爱”，鄂东地区特有的艾绒香包成为端午标志。蕲春自古还有独特的“人生三澡”艾浴习俗：婴儿新生“洗三朝”，结婚当日“百年澡”，离别去世“涅槃澡”，均用蕲艾熬汤冲水洗浴。

明清时蕲州更有习俗：亲人远行，以竹篮盛蕲艾相赠，篮上书“伴君远行，一路飘香”，歌谣传唱其情意与功效。《群芳谱》亦详载其效，印证端午“悬艾人、戴艾虎、饮艾酒、食艾糕”以“避邪禳毒”的习俗，至今犹存。在蕲春民间，“家有三年艾，医生不用来”的谚语深入人心，家家栽种、户户收藏蕲艾成为传统习惯。

小艾草撑起大产业

历史的积淀为蕲艾注入了深厚的底蕴，而新时代的机遇则让这株古老的药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2011年，国家授予蕲艾“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如同为这株本草明珠加冕，正式开启了蕲春艾草产业的腾飞之路。



蕲春县委县政府敏锐抓住了这一机遇。2013年，产业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吹响了系统化发展的号角。次年，雄心勃勃的“百亿产业”目标确立，产业协会应运而生。紧接着，首届李时珍蕲艾健康文化节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蕲艾魅力；国家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艾产业化联盟落户蕲春，为产业注入科技动力；千人同灸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更是在世人瞩目下创造了健康奇迹。2016年，“中国艾都”的桂冠花落蕲春，实至名归。

发展的脚步未曾停歇。2017年，蕲春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艾草产业大会，“中国艾都艾草馆”拔地而起，成为艾文化的展示窗口。2018年，“蕲春艾灸师”被认定为湖北省劳务品牌，为专业化人才输出铺平道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蕲艾以

其独特的防疫价值，入选“中医药预防新冠方案”，在守护健康中再立新功；同年，它跻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2021年是丰收之年：省政府将蕲艾列为重点发展的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之一；5月，“针灸（蕲春艾灸疗法）”荣登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年技艺终获国家最高文化认定；“蕲春艾灸师”更跃升为中国第一劳务品牌，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进入2022年，“千城万店”工程启动，蕲艾灸馆如星火燎原般遍布各地；蕲艾荣登“十大楚药”榜首，“蕲春艾灸”摘得“我喜爱的中国劳务品牌”殊荣。2023年，蕲春擘画了更宏伟的蓝图——“一片艾叶温暖世界”，剑指2030年千亿产值目标。

时间来到2025年5月，“中国品牌日”传来捷报：蕲艾品牌价值高达142.58亿元，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排名第21位（实现十连升），并获评“地标名品典型案例”。数字背后，是蕲艾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

一片艾叶温暖世界

蕲艾产业的崛起，远不止于经济数字的增长。从2015年品牌价值35亿元，到

2025年跃升至142亿余元，增长超四倍，这条上扬的曲线，描绘的是蕲春30万百姓依托艾草就业创业的生动图景，是4000家涉艾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的市场活力，更是2024年163亿元产业产值所代表的综合实力。小艾草，真正长成了支撑一方的大产业，成为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省级核心品牌和重点产业集群。

蕲艾品牌，是文化价值的凝练与升华。蕲春人深知，品牌之魂在于文化传承。他们以品牌为舟，解密艾草文化基因，考证弘扬李时珍“格物明理、济世寿民”的精神，推动承载着中医药智慧的蕲艾文化加速走向世界。设立品牌保护中心，精心研发18个系列近2000个品种的产品，让消费者在使用中感知蕲艾传递的千年药香与文化温度。品牌更是开拓市场的利器，树立起蕲艾品质高端的形象，畅通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渠道，让这片艾叶香飘万里。

这株小小的艾草，已成为连接蕲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全球、生态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它助推着蕲春加快建设健康之城、兴业之城、现代之城的步伐。成功的背后，是清晰的发展路径：

以品牌铸魂，人才兴艾：联合高校组建科研团队，不断研发新品种，发布并持续完善《蕲艾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让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以品牌致远，守护生态：牢牢抓住“道地性”这一核心，大力推进蕲艾的社会化、规模化、机械化，特别是生态化种植，生动实践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确保产业根基永续长青。



蕲春艾草工厂

以品牌聚力，协同发展：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技主引、群众主力”的四轮驱动模式。这种模式，完成了从“政府带着群众干”到“群众积极主动干”的深刻转变，营造了政通人和的政治生态，凝聚了高度共识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各方认同的优越环境，也夯实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

展望未来，蕲春县委书记胡安元满怀信心：将以品牌为笔，发展为墨，继续书写振兴中医药文化、促进人类健康的新篇章。千年艾草，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品牌赋能，正驱动着乡村的振兴。“一片艾叶，温暖世界”的宏伟蓝图，正在蕲春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徐徐铺展，香飘寰宇。

张月生，蕲春县文化和旅游局原副局长，李时珍纪念馆原馆长、文博副研究员

一名海归委员的家乡答卷

◇ 周恩东

人物名片：周恩东，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工商联执委，武汉常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武汉东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走出去，是为了把有用的东西带回来。带着所学，带着见识，更带着一颗想要为家乡做实事的赤子之心。从解决工地民工的实际需求，到建言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实干者的路，从来不会平坦。但我明白，想为家乡做点实事，光有热情不够，得真刀真枪地干，解决真问题。

跨海求学，家乡常在心中

我出生于武汉新洲，小时候经常穿梭于家乡的乡镇街巷，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深植于心。后来又在武汉外国语学校读书，高中毕业便远赴英国求学，在福德大学攻读物理专业。

异国的日子，是全新的世界。课堂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各抒己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像无数束光穿透了我原有的知识边界。课余时间，我总爱穿梭在异国的大街小巷，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站在带着浓郁异国风格的各类建筑面前，我也常常想起家乡的老建筑，想象着它们未来的模样。

虽然身在远方，家乡武汉的点滴却常在心头萦绕——熟悉的街道、亲切的乡音、邻里乡亲们质朴的笑容。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无论走多远，我的根永远深扎在新洲这片土地。于是，一个念头越来越坚定：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用我所学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创业之路，搭建供需之桥

2015年，我带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随后加入了湖北恒信国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负责智慧城市项目的研发、设计与应用。那段日子，我全身心投入，把所学知识和许多新的想法付诸实



周恩东（左二）和青年企业家学习考察房地产项目

践，带着团队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看着自己的努力能为城市的智慧化添砖加瓦，心里感到很踏实。

然而，我的创业之路并未就此止步。我出生于建筑之乡新洲，家族也从事房地产和建筑业。当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少工地都缺人手，而许多农民工们又常找不到靠谱的活，这中间的供需之桥断了，于是萌生了创办一个建筑信息共享平台的想法。2017年，武汉常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我带着团队开始研发“智慧工地民工巢”和“淘工宝”项目，就是想用信息化的手段，把劳务供需两头连接起来。

创业初期，困难接踵而至。技术团队缺乏相关经验，资金投入也很大。为了寻找合适的技术人才，我跑遍武汉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一次次与年轻工程师们探讨项目的可行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平台终于做成了。它实现了农民工从找活儿、上班打卡到领工资的全流程

线上管理，实实在在为工友们提供了便利，也提升了工地管理的效率，搭建起劳务供需双方高效对接的桥梁。

2019年，我出任武汉常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主持集团公司的经营管理。企业要发展，就得跟上时代，不断求变。于是，我着手推动管理模式改革，优化企业内部流程。同时积极开拓市场，集团以房地产为主业，也拓展建筑施工、农业开发等多种经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及社会效益都上了新的台阶。

担任武汉东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后，我克服困难，启动了常阳东骏城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我们秉持着“好地段、好设计、好品质、好房子”的理念，从投资、建设到运营，精雕细琢，想探索一种全链条的服务模式。特别欣慰的是，在当前房地产压力普遍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这一项目资金流一直非常充裕，没有向银行贷款过一分钱，是实实在在地搞建设。

如今，常阳东骏城已成为阳逻开发区的标杆项目之一。面对市场变化，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和启动新的经营模式，努力适应形势。

委员视角，聚焦地产难题

当选政协委员后，我常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在阳逻调研时，我发现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库存积压、供需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跑了数十个楼盘，跟开发商、买房的人、中介机构深入

沟通，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阳逻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及建议》提案。

在提案中，我建议政府应加强土地供应调控，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土地出让；鼓励开发商开发中小户型、低总价的刚需住房，满足不同层次购房者的需求；同时，推动产城融合，引入产业项目，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区域吸引力。这份提案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我还关注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问题，在《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几点建议》提案中，我从稳定市场预期、优化金融政策、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提出建议，呼吁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和调控，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此外，我也关注着城市更新。看到有些地方历史风貌保护不够，居民参与度低，便撰写了《我对城市更新的一点思考》提案。建议城市更新方式可以从更“细微”之处着手，保留城市的记忆和特色；更要建立机制让居民参与进来，居民不仅是受益者，也能参与到决策中。比如，召开社区议事会，让大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更新出来的东西才会更符合居民的需要。

坚守初心：良心·诚信·温暖

我深知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家乡滋养，总想为家乡做点实事。这些年，我用创业积累的一些资金，资助贫困学生，帮助困难家庭和老人，为家乡和学校修路、维修校舍、添置教学设备和文化体育用品，前前后后捐赠了400多万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抗疫是头等大事。作为企业家我责无旁贷，第一时间

安排公司的车辆去运输物资、抢修道路。我们农场的工作人员也主动站出来，把新鲜采摘的蔬菜免费送到各个物资点。同时，我主动免掉了公司所有商铺和农场租户的租金，疫情期间所有员工即使没上班，工资也一分不少、按时发放。算下来，公司增加了投入、减少了收入，累计600多万元。但我觉得值，关键时候，得尽一份力，也得让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安心。

现在，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作为政协委员和新一代的房产人，我想始终坚持做到三点：一是坚持做有良心的企业。我们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把建设品质好、住的舒适的好房子作为初心，打造新时代住房产品。

二是坚持做有诚信的企业。我们对上下游产业链资金及时支付，从不拖欠、不敷衍，并督促落实到位，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和材料供应商。

三是坚持做有温暖的企业。面对市场低迷的大形势，我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企业收入，坚持不裁员、不减薪。每一位员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需要支撑，因此确保每一位员工不失业，按时收到全额的工资，稳定职工队伍和他们的家庭。

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企业不只是赚钱的地方，更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平台。只有心里装着社会，关爱自己的员工，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在风浪中站稳脚跟。

回望来时路，我所有的努力和收获，都离不开家乡的养育和社会的支持。未来，我会继续怀着这份感恩和热忱，在企业发展的路上不断创新，在政协委员的岗位上尽心履职，为家乡变得更美好、为社会向前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为孩子的“童心”而坚守

◇ 陶双珍

人物名片：陶双珍，新洲区政协委员，童心教育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阳逻开发区校车运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2年盛夏，蝉鸣聒噪的午后，我望着邻居家因无人照料而不停哭闹的幼童，心底涌起一股冲动——在家中办一所幼儿园。彼时的我未曾想到，这个在自家堂屋支起小课桌的决定，竟串联起三十余载跌宕起伏的幼教历程。这是我幼教初心的萌起：让阳逻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爱的、专业的学前教育，让他们的童心自由生长。

从方寸堂屋到幼教集团

1992年夏季，我一个人又当园长，又当老师，在自家办起了幼儿园。那是只有30多名幼儿的堂屋幼儿园，环境有些简陋，

斑驳的墙面贴着手绘的识字卡，旧床单改造的窗帘随风轻摆。

每天清晨五点，我既要为自家的两个孩子准备早餐，又要将自家客厅桌椅重新摆放成课堂模样。记得寒冬腊月里，为了给孩子们热牛奶，我凌晨三点就要起床生火。冻得通红的双手捧着温热的奶瓶，但看着他们睡眼惺忪地小口啜饮，嘴角沾着奶渍却露出满足的笑容时，所有疲惫都化作了温暖的力量。

随着生源渐增，资金短缺成为面前的大山。为了购置第一台电子琴，我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项链。扩建园舍时，为节省开支，我和家人只能自己动手搬运砂石，烈日下推着装满砖块的推车，汗水浸透了衣裳，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

但最艰难的，是面对家长的质疑。有位奶奶攥着我的手说：“闺女，你这儿能教好孩子吗？”我二话不说，将园里的教学计



给童心幼儿园孩子们上课

划、卫生记录一一摊开给她看，还邀请她随时来园监督。正是这份赤诚，让口碑如蒲公英的种子般四散传播开来。

三十余载的孜孜追求，如今堂屋幼儿园发展成了童心幼教集团，旗下拥有童心幼儿园、童心一中幼儿园、童心旗舰幼儿园、航天城幼儿园、北辰幼儿园五所幼儿园。在园幼儿2000余名，拥有专业幼儿教师268名，童心教育成为市区学前教育知名品牌。

每当我考察集团旗下这些幼儿园，看到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优越的教育环境，脑海里依旧会想起那座贴满手绘卡片的老堂屋。

把教育情怀写成社会责任

幼儿园这片小小的天地，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希望，更承载着民族的未来。我们守住的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守护生命最初的光亮，守护一个国家最柔软的根基。在幼教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我怀揣着教育梦想，用心经营着我的事业，将教育情怀化作实实在在的社会责任。

办优质幼儿园，为家庭服务，是我最初的坚守。我深知幼儿是家庭的希望，是家长们的期盼。从师资招聘到课程设计，从环境创设到餐饮安排，每个环节我都亲力亲为。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温馨、专业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能快乐学习，家长们无后顾之忧。在这里，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爱的滋养。

我时刻关注着特殊儿童群体，尤其是留守儿童。他们就像渴望阳光的小树苗，更需要呵护与关爱。

我们特别为留守儿童开设了“亲情热线”，让他们能随时和远方的父母交流。对于身体或智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特教老师，为他们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帮助他们一点一滴地进步。看到孩子们脸上重新绽放出自信的笑容，我深切体会到：教育者的每一分耕耘，都在孕育一次新的奇迹。

让农村孩子享受城里的优质教育，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们积极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展孩子们的视野。还组织城乡儿童“手拉手”活动，让孩子们在交流中共同成长。农村的孩子们不再羡慕城里的同龄人，他们同样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探索知识的奥秘。

这份事业，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我愿继续用教育情怀书写社会责任，为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奠基，让幼教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打造幼教人才成长沃土

一路走来，最让我自豪的，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幼教人才。集团里多数老师

是来自阳逻本地的初中生、高中生，她们怀揣对幼教的热情而来，却缺乏专业知识技能。

于是，我开启了漫长又艰辛的培养之路。从最基础的幼儿心理学、教育学讲起，手把手教她们如何设计课程、组织活动。日常教学中，我鼓励她们大胆尝试创新，每一次的公开课，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成长机会。我会和幼教老师们一起磨课，从教学环节到与孩子的互动，逐一细致指导。

对于有潜力的老师，我会推荐他们参加各类培训和研讨会，拓宽视野。在实践与学习的双重驱动下，许多老师迅速成长。曾经青涩的她们，如今有的已成为当地颇具名气的园长，有的则是专业素养过硬的骨干教师。现在，童心教育集团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幼教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和精神的传承，它就像一场接力赛，需要一代代人薪火相传。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坚守，将这份幼教的火种不断传递，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孩子们成长保驾护航。

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我所经营的五所幼儿园，有两千多个孩子，他们大多住在城区周边，每天上下学成了难题。于是，40多台满载着希望的校车应运而生。这些校车，不仅是接送孩子的交通工具，更是他们安全、温暖的移动城堡。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安全的出行保障，在管理上我丝毫不敢懈怠。从校车的日常维护保养，到司机的严格选拔与培训，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详细且严格的标准。我们要求



童心一中幼儿园颁奖仪式

司机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确保每一次出行都平稳、安全。同时，还安排了细心负责的随车照管员，全程陪伴孩子，关注他们的状态。

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的校车公司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这份成绩，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更让我深感责任重大。如今，我们的校车不仅为幼儿园的孩子们服务，还承担起了阳逻街中小学孩子上下学的接送任务。未来，我会继续守护好这条温暖的上学路，让孩子们在平安的旅途中茁壮成长。

当选新洲区政协委员后，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些年，我提交的提案总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普惠与质量。要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早期教育；要让幼师这个职业更有尊严、更受认可，因为他们是孩子心智成长的奠基人。在政协的平台上，我呼吁加大对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的政策支持，推动建立更科学的幼师培养和评价体系。教育公平的种子，需要从幼儿园开始播种。

教育是慢工，是细活。我愿继续做那个护苗人，用真心换童心，用坚守换成长。

三次转折探路 “暖通” 向新而行

◇ 赵 铿

人物名片：赵铿，湖北省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华兴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蔡甸区人大代表。

思想的转折：重返校园，奠定根基

1982年，我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高管，母亲为妇产科主任。优渥宽松的成长环境，赋予我开放包容的思维和敢为人先的魄力。我常自嘲为“温室之花”，坦言早年经历单纯，心智成熟较晚。

受母亲影响，我考入武汉科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然而，面对繁复的医学课程，我深感迷茫与疏离。大三时，我休学进入父亲好友的企业历练。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此期间，有幸邂逅影响我一生的导师，一位被我尊称为“干妈”的杰出女企业家。她以睿智之言点醒我：“学历是立

身之基，完成学业是底线，但人生的疆域远非止于此。”这番教诲醍醐灌顶，成为我思想的转折点。我重返校园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一颗创业的种子，自此深植于心。

2005年大学毕业，我没有回到家乡进入医疗体系，而是选择留在武汉，投身陌生的商海。初入商界，幸得一位经验丰富的伙伴引领，共同经营贸易。虽收益平平，却积累了宝贵的商业经验，领会到商场如战场的严峻。三年后，与合伙人在西部发现矿产机遇，我倾尽积蓄投入开矿。当盈利曙光初现之际，团队却因利益分配陷入严重分歧，最终合作破裂。此番挫败，令我投资几近血本无归，初次直面创业的残酷与风险。

此后，我步入人生的低谷期。父亲的包容与无声的勉励，成为我暗夜中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历经一年的沉淀与挣扎，我从干妈——那位曾指引我重返校园、以非凡毅力成就事业的残疾人企业家身上，汲取了重生

的力量。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自考成才，从零起步，历经三十余载，将一家传统作坊打造成为年销售收入数千万的省级专精特新科技企业，并荣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她筚路蓝缕的奋斗史深深震撼了我，点燃了我内心深处重振旗鼓的决心！

2013年，我重整行装，加入干妈公司。从基层岗位干起，逐步熟悉公司运作流程。后来我发现销售乃驱动公司发展的核心引擎，主动请缨转战销售一线，凭借真诚沟通与不懈毅力，我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合作，尽管过程布满荆棘与拒绝。然而，当公司引入职业经理人并推行制度化改革，面对日益繁冗的形式主义流程，我深感其与实干效率的背离。2015年，一个声音在心中愈发清晰：是时候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业征程，以践行心中的经营理念。

事业的转折：中标暖通，逆势崛起

彼时，干妈因前期厂房投入巨大，与总经理产生经营理念分歧，后者想要退出，我敏锐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契机，于是主动请缨接手。原总经理退出，我注资入主，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接手时的景象记忆犹新：公司仅余一名工程师，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为破局，我带领团队尝试利用热泵技术研发组装烤烟设备，希冀开辟新赛道。我们奔赴宜昌、恩施等地推广，免费投放设备、派遣专人驻点调试。

然而，设备尚处工程验证阶段，烟草娇贵难以实现全自动烘烤，需全程人工干预。团队人员长期扎根偏远村寨，部分设备因效果未达预期，收费更是困难重重。高昂的制造成本远超农户承受能力，政府亦无专



调研小米汽车展厅（左二赵铿）

项扶持，加之区域电力增容瓶颈凸显。项目虽具节能减排潜力，却因商业模式未闭环而难以为继。

期间，我依靠承接其他工程项目勉强维系烤烟机研发投入，但坚持两三年后，累计亏损逾百万元，理想遭遇现实的重击。

面对持续亏损带来的股东质疑与信心动摇，我再次选择了担当，毅然扛下所有债务，仅接手公司空壳及一处500余平方米的无证房产。自此，我全盘执掌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华兴隆。面对困境，我立下军令状：一年内清偿公司110万元亏损，并承担对其他股东的补偿责任。这份破釜沉舟的勇气，源于骨子里的坚韧与对责任、承诺的深刻认知，创业之路，竟始于负债。

我签署所有条款，正式迎接这场背水之战，并将公司更名为“武汉华兴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昭示转型决心。为维持运营，我将大部分空间出租，仅留一间斗室自用。命运之转机悄然降临，一位租户手中有一家新三板上市公司资源，正寻求本地合作伙伴，经过周密研判与坦诚谈判，我最终出资成为其湖北公司法人代表。此次战略合作，成为撬动我事业版图的重要支点与转折点。

2017年，依托该新三板平台，我们接触到一项近千万元、需大额垫资的暖通项目。我深知，唯有破釜沉舟拿下它，公司方有绝境逢生之机。秉持“行者常至，为者常成”的信念，我以近乎孤注一掷的决心全力押注。面对专业标书制作的高压，我与核心团队通宵达旦、精益求精；遭遇严峻的资金链考验，我多方奔走、竭力筹措。那段时间压力如山，寝食难安，但团队的凝聚力与背水一战的决心支撑着我们。最终，我们成功中标，克服万难以卓越品质和诚信履约圆满交付。此役，不仅赢得市场口碑，更淬炼了团队。

此项目的成功，为公司撕开了市场坚冰，打开了全新局面。我广纳行业贤才，全身心深耕暖通领域。项目执行过程中，资源网络与业务路径不断拓宽，我果断将目光锁定于千万级重大项目。凭借精准策略与团队拼搏，公司业绩首年即突破3000万元，次年直逼亿元大关，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诸多同行选择收缩自保时，我却看到了逆势布局的机遇。力排众议将公司迁至更具发展潜力的武汉经开科技园区，租赁大面积现代化办公场所，并引入物联网技术打造智能化办公环境，在我看来这才是一家科技公司应有的姿态与实力象征。我坚信“危机即转机”，带领团队锐意突破行业壁垒，凭借领先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超越期待的客户服务，在寒冬中成功斩获多个大型优质项目，实现了逆势飞扬。

有一次竞标经历令我至今难忘：在四家实力强劲的竞争者中，我方报价居中，各家技术方案评分均为满分。事后方知，招标文件暗藏一项极为苛刻、本无法满足的隐性条件。其他竞标者均自信填写“满足”，唯



赵铿在公司门口留影

我秉持商业诚信之本，对此项如实空缺。未曾想，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坦诚，成为最终意外中标的决定性加分项。它深刻印证：诚信，是商海立足最坚固的基石。

人生的转折：夯实根基，向新而行

2024年，借商会换届契机，我荣幸加入湖北省江西商会。融入这个精英云集的平台，感触良深。虽与各位会长结识时日尚短，却倍感志同道合，如遇故交。在一次次交流与深邃的思想碰撞中，我的视野得以拓宽，表达与沟通能力显著精进，更汲取了弥足珍贵的商业智慧与人生洞见，实现了认知层次的突破与自我超越。

在湖北暖通行业，我与华兴隆已赢得一席之地。我们核心竞争力在于，成功打通了工程实施与软件研发的壁垒，通过高度协同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无缝衔接、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我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客户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与江山。唯有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深度洞察并超越其需求，

持续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企业方能穿越周期，基业长青。

去年一年，公司签约合同额近 1.5 亿元。面对亮眼业绩，我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选择了及时“战略刹车”。我清醒地认识到生存之后的要务，是筑牢根基。贪大求快如同沙上筑塔，唯有精耕细作、夯实管理、技术、人才的内功，方能支撑企业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商场如战场，市场需求瞬息万变，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建筑行业整体进入深度调整期，竞争日益白热化，客户需求愈发多元与严苛，前路如负重登山，步步考验定力与智慧。我常对团队坦言，虽当前暂无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但对未来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懈怠。科技创新，是我们抵御风险、赢得未来的不二法门。

因此，我们主导并倾力投入研发了“华兴隆智慧能源一体化管控平台”。该平台深度融合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可对项目中能源系统的“源、网、荷、储、配电、环境”等核心要素进行全景式远程实时监控与智能故障预警，实现运行策略动态优化、关键区域无人值守，全面保障能源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平台生成的精准能耗分析报告，为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最终达成能源管理数字化、可视化、精细化的目标，切实推动客户节能降耗、降本增效。

公司在稳固暖通空调、机电安装等传统核心业务优势的同时，积极拥抱绿色低碳的时代浪潮，探索向绿色建筑全品类综合服务商转型。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全新的技术高地与管理挑战。

转型初期，团队在跨领域项目管理经验、陌生施工技术、复杂内外部协调等方面

面临阵痛。通过系统性内部赋能培训、高效整合外部顶尖资源、大力引进专业领军人才以及在实战项目中不断淬炼，我们成功提升了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参与深度与广度，并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跨界经验。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与持续的技术攻坚，公司相继斩获“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关键资质，并拥有 3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构筑起坚实的技术护城河。

如今，武汉华兴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转型为专注于新型可再生能源工程与智慧机电系统综合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以智慧能源管理为核心引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致力于赋能建筑实现低碳、智能、高效运行，打造了集“前瞻性方案设计、自主化产品研发、全生命周期系统运营”于一体的核心竞争力，荣膺湖北省“专精特新”企业称号，这是对我们创新之路的有力肯定。

回望征程，我深知企业经营是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马拉松，贵在坚守初心，久久为功。这一路探索与打磨的过程，也悄然磨砺了我性格中的浮躁与冲动。我深刻领悟到万物生长的内在韵律：如同种子破土需要积蓄力量，花朵绽放需要时光酝酿。我学会了敬畏时间的力量，尊重经营的规律。常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着眼“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布局，保持“拥抱变革”的开放心态。我坚信，只要根基稳固，方向清晰，定能静待华兴隆科技向新而行，稳健地迈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

大别烽烟（上）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七

◇ 涂文学

武汉保卫战的另一战场，是大别山北麓及淮河南岸地区。大别山是鄂豫皖三省界山，一般海拔为400—1000米，北麓尤为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早在1938年7月底，日军即以第二军集结于六安—霍山一线，计划从9月上旬开始西进作战。

对于日军在大别山的进攻计划，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最初并未予以重视，以为其主力和主要进攻路线在长江北岸，“六安、商城迂回过远，霍山则地险粮缺，六霍方面不过支线作战而已”。因此，将兵力主要部署于长江北岸一线，这点让日军也感受到了：“当时，六安和霍山以东的各条道路虽被敌彻底破坏，但该地以西的道路至今未被破坏。在第二军集中期间，大别

山脉北麓方面之敌陆续向扬子江方面转移。据观察北麓方面之敌的兵力有继续显著减少之现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1）。

在了解到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后，日军决定8月20日起开始行动。“第二军根据以上情况，为了不给敌人破坏六安及霍山以西的道路的机会，乃变更原计划，急速（8月下旬）开始行动。从现在线上（庐州地区）一举进入光州—商城一线，尔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以北地区作战。于8月20日按下列要旨，下达命令”。（《中国事变

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1）。

为了确保大别山北麓作战胜利，日军布以重兵，包括其第2军所辖第3、10、13、16师团。第10师团计划在击败六安附近国军后，急速进入光州附近，大致准备向信阳方向作战；第13师团计划在击败霍山附近国军后，急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地区作战；第16师团随着作战进展，以一部担任固始、叶家集以东庐州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及附近战略要地的警备任务，同时逐步向固始附近推进。特别派出约两个大队的步兵队伍，作为先遣部队替换在舒城、桐城方面的第13师团的部队，负责确保舒城—桐城之间的交通路线，然后尾随第13师团接过霍山附近的警备，令其警



宋希濂部第36师“德械师”

备英山方面。第3师团在8月23日以后向江北移动，在庐州、桃镇附近集结兵力，继续担任江北津浦沿线地区的警备。

中国军队方面，1938年7月，《第五战区作战命令》对大别山北麓作如下兵力部署：“中央兵团应保持重点于霍山以南地区，以主力之第四十八军及第七军在六安、霍山、管家渡、磨子潭、岳西间地区集结，准备向合肥、舒城、桐城、怀宁方向攻击，先各以一部支援地方武力，竭力挺进，扰乱敌之集中及运动，可能时攻占合怀道上各要点，以为向前游击之根据”。“第十九军团集结于叶集、商城附近地区，速行编并，并随时准备向六安方面推进。该总司令部应移立煌附近”。“左翼兵团应以第二十六军、八十七军重点在右集结于潢川及新蔡附近，各推进一部于霍邱、颖上、阜阳以为根据，向淮北地区游击，并与第一战区在太和、沈丘一带之部队密切连系”。（《第五战区作战命令1938年7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08）。

关于豫南地区，1938年6月8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亦有布署：“1.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部固守黄麻以北大别山阵地并控置，冯治安、徐源泉部于麻城、宋埠间，策应各要路口作战。2.胡宗南及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与占领阵地部队相连系，努力击破该方面包围之敌。3.必要时，十三师可抽调使用于宣化店附近固守隘路。4.最后应确保大别山阵地及信阳，使武汉部队作战容易”。（《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

6月8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06）。

富金山战役

日军的进攻于8月27日开始，第10师团进攻六安，第13师团进攻霍山。开战伊始，作战异常顺利。28日，第10师团冈田支队在战机配合下，辅以大炮、坦克进攻六安，国军第51军两个团顽强抵抗，终于不敌，当晚10时左右，六安失陷。29日，第13师团沼田支队进攻霍山，国军第37、113师分别在圣人山、大河厂、独山镇等地与战，日军施放了毒气。30日，沼田支队攻入霍山城，守军与之展开激烈巷战，伤亡惨重，霍山失守。

9月1日，第13师团先头部队在叶家集附近集结，次日向叶家集、开顺街发起攻势，国军第36、114师虽拼死相守，但叶家集仍于2日被攻占。日军随即强渡叶家集西南的史河，以迅速翻越大别山，但在富金山遭遇顽强阻击。

富金山位于固始以南50公里，为大别山支脉，宛如扇形，山势挺拔，相对高度约500米，东距史河6公里，西距信（阳）叶（家集）公路2公里，向南不远则是霍（山）商（城）公路，为阻止日军进犯信阳的咽喉所在。

为扼止日军猛烈攻势，宋希濂第71军的4个师（第36、88、113、114师）在史河西岸及富金山高地之纵深8公里布置数道防线，宋希濂亲临一线督战。自2日夜开始，日军第13师团主力就反复向富金山左翼阵地发起猛攻，国军第36师呈梯形配备，粉碎多轮进攻。3日，日军攻占第114师及第51军八里墩阵地和第36师史河西岸沿岸

阵地，并向石门口阵地及富金山东北面、陈家琳南面阵地进攻。4日，日军加强对富金山的攻势，第13师团从叶家集西面向陈家琳南端、富金山进攻，一度占领富金山第三高峰马鞍山。国军拼死反攻，坚守丁大山、熨斗山的两个连全部牺牲，第523团营长杜振华壮烈殉国。下午，第114师680团在683团配合下，反击八里滩日军并收复八里滩，日军退守开顺街，也付出惨重代价。“第十三师团虽对叶家集以西的敌阵地进行全力攻击，但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师团伤亡已达一千数百名，加上掉队的（因患疟疾）也不少，一个步兵中队平均只有40名；再有步兵联队长患病、大队长一级的伤亡也多，所以战况不易取得进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2）。

5日，国军第36师在石门口、富金山阵地与第13师团激战，击退多次进攻。6日，在三里岗、石门口、富金山继续激战，双方互有伤亡。7日，日军在正面进攻富金山的图谋未得逞的情况下，采取外围作战方式，派第10师团濂谷支队，从黎家集直趋富金山侧背的方家集，企图迂回包围并切断国军后路，但在距方家集约5公里的樟柏岭附近遭到阻击，不仅未能进入方家集，反而损兵500多人。

第13师团继续在富金山等地作战，国军第36、48师等在富金山、文家店、下板桥附近与之肉搏鏖战，处于对峙状态，双方伤亡巨大。8日，第13、10师团在进攻未果情况下，施放了毒气。9日，第16师团主力到达叶家集，支援第13师团作战，“随

着配属给第十三师的独立机枪队、独立轻装甲车队、炮兵部队等的到来，逐步使攻击有了起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2）。第13、10师团继续猛攻石门口、富金山阵地，国军第36师与之激战竟夜，第697团团长李超林阵亡。

10日，日军战机对富金山阵地展开轮番轰炸，第13、10师团亦加强地面攻势，国军守卫山顶的一个连全部壮烈殉国。第36师从富金山侧击日军，敌军亦有伤亡。11日，第13师团在第16师团的配合下，向富金山主阵地发动进攻，施放了毒气。国军第36师拼死反击，与日军白刃肉搏，最后只剩1000余人，不得不撤出阵地。夜间，日军攻占了富金山主峰。12日，日军突破第31师防守的武庙集。14日，第16师团攻陷第30军防守的方家集。随后，第13、16师团一起西进，15日，双方于商城峡口发生激战，国军与敌冲锋肉搏十数次，日军伤亡3000以上，国军亦伤亡1400余人。下午，峡口失守。16日，第13、16师团联合进攻商城，该城地势低洼，无险可守，国军第30军无奈于当晚弃守商城。

从9月2日至12日，富金山保卫战历时整整10天，虽然以阵地失守而告结束，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拼守，使骄横的日军感受到巨大压力，延缓阻滞了西进大别山北麓的



富金山战役中的日军伤兵

进程，诚如畑俊六在日记中所记，以最初作战设想，以第13师团向麻城方面突破大别山脉已难于实现，因此华中派遣军不得不改以第16师团为主力，替代第13师团突破大别山以与第6师团策应。日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惨重，第13师团患病7000多人，战斗死伤1000多人，并有好几个大队长战死，战斗力明显下降。

富金山战役，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战后，村民自发为抗日英烈建了一座纪念碑，正面碑文叙述富金山战斗经过，两侧对联：“为国捐躯忠魂冲九霄，旧事不忘英烈垂千古。”2010年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当地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又在富金山临路山腰处建起一座更高纪念碑，碑座高71厘米，代表该战役中为国捐躯的71军将士。

沙窝一小界岭战役

日军占领商城后，按照既定计划，“沿商（城）麻（城）公路南犯，企图略取麻

城”。攻取麻城，小界岭是不可回避的关口，作为大别山北麓最后一道防线，第五战区早已严阵以待，重兵把守。孙连仲第2集团军的3个军，全部部署在商城南部的沙窝、大小界岭一带；宋希濂第71军布置于余家集、沙窝至小界岭一线，负责左翼；第30、42军为右翼；田镇南第30军30师布防于两路口、大界岭以东至黄马乌鸡寨，31师布防在黄马乌鸡寨至新店以北一带山地；冯安邦第42军27师和于学忠第51军布防于达权店至金刚台一线，总兵力共计10余万人。日军第13、16师团及第10师团濑谷支队等，共约5万余人。

9月15日，日军令第13、16师团迅速从大别山区向武汉平地推进，截断广济方面中国军队的退路，第13师团目标为白杲，第16师团目标为宋埠。16日，第16师团占领商城后，派第30旅团作为先遣队开往沙窝南面。17日，第16师团筱原支队进攻余家集、显山一带第71军阵地。18日，进军至商城西南25公里处的沙窝，与第30军和第71军发生激战。19日，筱原支队继续向余家集，显山一带阵地发起猛烈攻势，国军第30、88师在沙窝附近占领阵地，并在余家集、吴湾、李家凹、沙窝及其南面高地与日军交战。同日，沼田支队到达商城以南20公里处的新店，遭到第42军反击。

自20日起，筱原支队向坚守沙窝东西两侧高地的第71军不断发动攻势，国军第30军在沙窝附近的打船店、沙河、新店等地凭借有利地形，与之激战；第88师顶着敌人猛烈炮火，在西南岩山与敌作殊死抵抗，晚10点岩山阵地失守，沙窝三面阵地也先后失守。

21日，沼田支队在沙窝以西河滩、清水塘以东进攻第30师阵地，新店北面地区

失守。22日，第16师团先遣队进攻小马黄冲、磨盘山、杨家寨等地区，第30、27师与之激战，并在磨盘山主阵地重挫敌军；第13师团进攻打船店、许家冲的第31师，战斗中施放了毒气，31师仍顽强击退日军；第88师在沙窝西面一天门附近，乘夜雨向占据沙窝西端高地的日军反攻。23日，第31师与第16师团先遣队继续在打船店、许家店地区激战。数天战斗，中国军队战绩颇佳，歼敌2000有余。

24日，日军步兵58、116联队攻至离小界岭1000米左右的山脚下，以密集炮火将小界岭烧成火焰山，国军61师逆风冲向山下日军，沼田支队败退。在沙窝以西磨盘山一带，第30师在第31师一部策应下，不断向第16师团先遣队发动反击，但阵地被日军猛烈炮火摧毁伤亡惨重，被迫退守打船店南端两侧高地。25日，日军新增116联队并发起总攻，国军从沙窝北面迂回至筱原支队背后实施夹击，并威胁其商城至沙窝公路的后方补给线。筱原支队不顾一切，继续猛攻磨盘山周围的骆驼山、杨家寨、马黄冲等正面阵地，被第88、36、30师击溃，图谋未能得逞。同一天，第13师团对许家冲第31师阵地大举进攻，并施放了毒气，国军中毒伤亡惨重；在盛家店、打船店等阵地，第27师在第31师一部配合下反击，经过几轮拼死肉搏后夺回阵地。26日，日军第16师团先遣队利用风向施放大量毒气，攻下磨盘山主峰；沼田支队亦攻占第31师据守的许家冲前方高地。27日，第16师团主力从商城出发，击败筱原支队背后的国军，进入沙窝地区。

在余家集周围一带，国军第87、88、61师分别在打儿窝、七里桥、香米村与第16师团交战，第31师则继续在许家集一带

与沼田支队交战竟日。28日，第87师在沙窝附近的打儿窝、吴家湾、曹家集、白雀园等地，与第16师团激战；在杨家寨、骆驼山、磨盘山等处，第16师团先遣队也遭到反击。29日，第13师团主力也从商城出发，进入新店以北地区统辖沼田支队，准备攻击。但天不佑日军，秋雨连绵，山路湿滑，登山极为艰难。中国军

队乘机阻击。在沙窝地区，第30师向占据磨盘山的第16师团先遣队展开反击，第87师与第16师团第38联队整日激战，沙窝北面950高地失守。30日，第16师团骑兵队进攻白雀园一带，第30师予以猛烈回击。同日，第27师主力与第31师协同行动，对盘踞打船店西岸和许家冲附近的第13师团予以反击。

10月1—5日，沙窝—新店地区的国军与日军持续对峙，时有交战。第27师在许家冲、打船店、盛家店反击日军；第31师在金刚山、大河冲、蔡家凹等地与第13师团交战。4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密电蒋介石，分析大别山战局并提出建议：“综合近日敌情判断如下：敌纠集兵力自合肥、六安西进，判断其意图不断继续增援，由新店、沙窝方面南下，冀突破大别山脉，进出麻城，威胁我右翼兵团之侧背，使进攻江北进展容易；或则主力向罗山西进攻信阳，截断平汉路，并转移其主力，一由新店攻宣化店趋黄安，一由大新店趋广水。我为应付该敌计，以左翼兵团各部固守大别山脉各隘



日军进攻六安受阻于被破坏的桥梁

路，并准备以有力部队随时出击以牵制敌之西进……”（《李宗仁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10月3—4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46）。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大了对沙窝—新店—小界岭一线的支援，将第10军调至麻城以北地区，并多次命令第51军在日军后方发起大规模反攻。李宗仁则命令第五战区右、中各兵团策应商城与罗山方面作战，在广济以西与黄梅之间地区及六安、叶家集、霍山、固始地区发起攻势，扰乱敌后方。

6日，日军第16师团向宋希濂71军大举进攻，血战三日，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在沙窝地区占领部分阵地。同一天，第13师团自商（城）麻（城）公路以东绕攻冯安邦、田镇南两部右翼，双方在打船店东南方山地激战。第13师团在飞机、大炮配合轰炸的同时还施放了毒气，冯部伤亡惨重。新店方面，双方在黄土岭、鸦雀尖发生激战。8日，第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进攻

第27师新店东南高地，以猛烈炮火整日不停狂轰滥炸，官兵全体壮烈殉国，夜间日军占领新店。但徐源泉第10军和丁治磐第41师仍在新店附近将军集、关水河、鸦雀尖、狮子口等阵地坚守。

在上述阵地中，日军尤集中主力攻击商麻公路上的制高点鸦雀尖。国军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赴狮子口督战，保卫鸦雀尖。日军1000余步兵在炮火配合下猛攻并施放毒气，黄樵松和副师长均中毒，狮子口以北阵地多被摧毁，鸦雀尖一度失守。国军拼死一战，与敌肉搏十多次收复阵地。这次战斗，歼灭日军200多人，国军伤亡109人，一名营长阵亡。

随后，两军在李家山、鹅家山、狮子山等阵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国军第87师第517团团团长李之用在李家山战斗中“亲率残部，身先士卒”，与第16师团近藤支队激战14小时，终因重伤殉国，全团打得仅剩65人。其他国军也严重减员，田镇南第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不及3000人，其中第30师只剩137人；宋希濂第71军3个师仅余4个团。13日，徐源泉第10军接替田镇南第30军防线。

15日，日军向洪店、李家高山、天鹅铺蛋、洗毛屋基寨、长岭阵地发起总攻，国军第30、71军尽管兵残将折，仍极力反击，多次击退第16、13师团的进攻。战斗呈白热化，洪店与李家高山守军数百人牺牲，仅剩数十人突围。天鹅蛋铺守军亦伤亡巨大，第30师所守942高地的官兵死伤者众。日军亦伤亡惨重，如第16师团33联队有一中队最后仅剩13名官兵作战。

此时信阳已失，北路日军已越过桐柏山脉，全线为之震动。第五战区不得已命令大别山北麓一带守军伺机转移，沙窝主阵地

的第71、30军渐次向湖北随县转移。日军第16师团主力于24日翻越大别山，从小界岭进入湖北境内。25日，第16师团主力攻占麻城。26日，在新店作战的第13师团主力击退国军第41师进入麻城，第16师团主力进占宋埠，而此时武汉已弃守沦陷。

沙窝一小界岭战役历时近一个半月，中国军队的顽强坚守和拼死抵抗，粉碎了日军快速翻越大别山进军湖北的计划，迫使日军改变战略进攻重点，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

是役，消灭日军有生力量总计21886人，其阵亡4506人中将校佐达172人、负伤1738人中将校佐达526人，占武汉会战日军伤亡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军队也付出惨重代价，阵亡将士超过20000人。

沙窝一小界岭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其作为武汉会战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仅有的没有被日军突破的战略防线，因之被誉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汉口申新四厂内迁宝鸡

◇ 刘 磊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后，抵抗日本侵略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自抗战爆发，东部地区工业内迁西部，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带动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其中，汉口申新四厂在宝鸡建立分厂，一方面支援了抗战，另一方面促进了宝鸡地区的工业发展。

焦土抗战与强制内迁

战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沿江地区的城市，而这些地区恰恰最易遭受日本人入侵。这些地区之外，是辽阔的内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和西康八省。战争爆发的1937年，西康之外的七省共有工矿企业237家，资本额1520万元，而同时期仅福建、浙江两省的企业，资本总额就在一



申新四厂宝鸡分厂所在地建成抗战遗址公园

亿元以上。卢沟桥事变后，迫切需要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内迁的主体。

同时，私营企业家也受到催促，要将工厂迁离日军的进军路线。早期，内迁的目的地为湖北武汉，但不久武汉也危在旦夕，只得再度迁徙，一部分迁往广西或湘西，一部分迁往陕西西安和宝鸡，总共623家私营工厂迁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尽管早在抗战前，国民政府内部已有人意识到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但当时并未面临

生死考验，企业内迁后方的计划并无实质上的推进，直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才匆忙展开。

为统筹安排企业内迁，国民政府成立一系列机构进行组织安排。1937年7月22日，秘密成立国防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负责资助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后方和紧急拨款抢运滞留沿海的主要战略物资事宜。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也负责协助工厂内迁，派遣林继庸赴上海调查，出台《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提交行政院。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这一提案的大部分内容，并责成资委会为主办机关，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联合组织监督委员会，“严密监督，克日迁移”。此后，又成立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的工厂迁移委员会，主持上海的企业迁移工作。

9月下旬，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与战争的不确定性，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资委会秘书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为加快内迁协助申请贷款、供应原料、调整产销，以至技术辅导。

一系列沿江沿海企业开始内迁之路，初期主要是将上海的工矿企业迁出。8月13日沪战爆发，12月11日镇江运输站撤退，这一时期从上海迁出民营工厂141家，其机器及材料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其中纺织业7家。这一时期，汉口申新四厂的负责人李国伟等人也在考虑内迁事宜，但由于股东内部存在争议，他们无最终决定权，因此未在初期立刻动工拆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示“守土抗战”的决心，一方面又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提出了“焦土抗战论”。八一三事变后，汪精卫在《最后关头》的讲

话中提出：“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化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李宗仁面对广州记者采访时发表中日问题谈话，再次提到：“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焦土抗战下，坚决禁止一切可能资敌的行为，而利用一切可能将工厂随政府搬迁。

1938年8月，武汉市政当局召集各企业会议宣布：“上峰非常注意，即一草一木亦不能留存在汉，如不遵行必定代搬，否则毁去。”这正是焦土政策在地方实施的代表之一，政府运用强制手段迫使企业搬迁。

申新企业高层反对内迁

面临战争的凶险与政府的强制，申新四厂部分股东仍不赞成拆机内迁，反而将希望寄托于洋人身上，希望国民政府看在是外资企业的面子上不用迁移。同时，还将不切实际的希望寄托于日军会惧怕列强，不敢对该厂如何。

荣氏家族内部也存在争议。荣德生认为“汉口守不住，内迁也没有办法”，其根源在于这一时期，申新四厂的盈利在申新系统中占据较大份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后，申新在上海的数家工厂停工，只有租界的两家能开工半天，且很多原料无法运进上海。而申新四厂远离战区，产量和销量都独占鳌头，5万纱锭、800多台布机全部开足，获得巨大利润。当年，每日出纱可达120件，共生产39000余件，比1936年增产6.4%。关于这一点，申新四厂负责人向上海股东的汇报也曾提到：去年棉产亦丰，因战事关系，多滞留汉口，彼等既得廉价之原料，而纱价又高，故获利甚多。

这一时期，申新四厂获得高额利润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遭日军进攻。当时上海及周边江苏等地的棉纺织工业产能占全国一半以上，战争爆发后遭受严重破坏，武汉则成为全国轻纺工业的主要生产中心。因此，面对高额的利润且日军尚未接近湖北，企业股东更加不愿意冒险内迁。

围绕内迁，申新内部出现两种意见。荣德生和在上海的申四股东坚决不拆不迁，持观望态度，荣德生提出“一动不如一静”。在汉口的副经理等人也不同意拆迁，甚至说“宁可弃之江中，也不迁之于川”。在汉口主持工作的李国伟、章剑慧等人则主张拆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

双方争执不下，一直持续到1938年徐州沦陷，武汉形势陡转。李国伟、章剑慧等人一边开始准备拆迁考察新的厂址，一边维持在汉口的正常生产。4月，李国伟入川考察并选购厂地，5月初返回汉口，几经磋商后，荣德生勉强同意将一部分老旧机器拆下运往重庆。6月，旧纱锭2300余枚，旧布机80台拆卸装船，通过宜昌运往重庆。7月，战争局势日渐紧张，不得不停工搬迁，由瞿冠英从四川转往陕西宝鸡办理迁厂事宜，8月底，李国伟赴宝鸡决定购进斗鸡台基地。9月，返回汉口后，向组织内迁的机构工矿调整处借款10万元办理内迁事宜。尽管当时荣家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但在局势变化下，申新四厂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荣家内部始终犹豫不决，还企图借美商名义逃避内迁，8月2日已与美国企业达成协议，结果遭国民政府经济部反驳，未被批准。9月6日，申新四厂副经理华栋臣致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函：“今日接经济部通知，所报出租美商事，未便照准。”假借洋人名义的同时，荣家又多方疏通乞求

不搬。由于工业内迁已经在国民政府中达成一致，各地唯有执行，荣家的企图又一次落空。8月8日，申四经理致电荣鸿元言明政府之决心。信中提到：“两厂迁移事，势在必行，焦土政策，毫无申辩余地。”至此，拆迁已成定局，无论是否同意，都只能向后方迁移。

中共和工合推动内迁西北

面对政府的多次催促，申新四厂开始匆忙拆迁。开始和其他民营工厂一样，内迁的首选是西南重庆，但因水路已经拥挤不堪，不光船只运费很高昂且时间紧迫，十天半个月也排不到，而通往陕西的铁路交通尚未被日军截断。所以，宝鸡成为最合适的地址。

申新四厂迁往宝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沦陷后，一些爱国人士商讨救国活动，美国记者斯诺在一次会议提出，沿海工业已经毁于战火和被敌人侵占，应当动员后方发展手工业来支持抗战。与会者当即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召集人。

艾黎立刻取道广东前往武汉拜谒政府当局，建议组织工业合作社，得到宋美龄的赞助，经行政院孔祥熙核定后，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直隶行政院并得拨款500万元。总会设重庆，全国暂分西北、西南、东南、华中四区，每区设立办事处，办理全国工业合作事宜。

工合成立后，中共长江局领导人之一博古会见艾黎，希望将武汉的工业部分迁往西北。他提出，一旦日寇持续西进，西北可能成为八路军坚持游击战的地区，如果把武

汉的工业疏散到西北，一定会对抗战起到重要作用。于是，艾黎向宋美龄提出将武汉的工业部分迁往西北，得到同意。宋美龄与艾黎等人一起参观申新四厂，提出尽快内迁是“最高命令”。宋美龄对章剑慧表示，申新如愿迁往陕西宝鸡，政府可以协调火车帮忙。

选定新址后，申新四厂便奉国民政府经济部之令，内迁宝鸡十里铺，投资300万元买地筑房，创建宝鸡分厂。但由于事先未做充分准备，在仓促内迁中损失较大，部分机器未能运出，一些储存的物料也在路途中损失。原计划运输“纱机2万锭、布机400台、粉机3000袋一套及发电机3000瓦者全套”，但运输途中遭遇日军劫掠，最终抵达宝鸡的纱锭1.6万枚、布机300余台、一部发电机和几台车床。

宝鸡分厂建成开工

经过多重路线的周转，申新四厂的绝大部分机器运抵宝鸡。当时的宝鸡以农业种植为主，几乎没有从事工业的场地，最后确定为距宝鸡十里地的斗鸡台。

斗鸡台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临近陇海铁路，靠近斗鸡台车站，运输条件较好。原料、机物料在这里卸下，便于转运进厂；生产出来的纱、布推出车间，就可直接装上火车，运往沿线各省。且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正在修筑，宝成路也在拟议中，通车后即可迅速运往陇右、巴蜀等地。

内迁时，大部分机器都是拆卸运输的，为防止后续设备出现故障，最初的随迁工人中计划带上70名技术工人及其家属，其余工人需要就地解散。李国伟要求25天完成所有拆卸任务，工人加班加点23天便完成，却没打算给工人遣散费。工人起初选择协

商，但看着大部分设备都已随车离开，只得选择较为激进的方式堵路，最终每人获得7元的遣散费。

选址后的购地，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李国伟等人请宝鸡县政府出面帮忙购地，但农民不愿意轻易交出土地，用漫天要价的方式让厂方放弃。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再加上官厅的恫吓威胁，最终农民妥协，地价以官价为准，按三年来土地价格的平均值计算：水田每亩100元左右，高地40到50元。

8月至12月，申新四厂从乔过金等184户农民手中购买张家村和张家底一带的176亩农田，又向张汗、张铨等265户农民购买181亩坡地。至年底，共购买土地约400亩。在此后的数年里，又多次购置新的土地以扩大厂基范围。

在宝鸡的数年间，申新四厂共购置土地1000余亩，其所在的斗鸡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业种植区转身成为全省的“秦宝工业区”。可以说，申新在宝鸡建厂，带动了宝鸡乃至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

宝鸡分厂于1939年4月奠基兴工，至8月厂房全部建成开工。从当时的媒体报道可知，建厂得到了翁文灏和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在经济和物资上的帮助。

宝鸡分厂十几间平房作为纺纱工场，安装几台粗纱机和一台细纱机，准备小批量生产，但运来的发电机安装需要时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原动力。从近邻大新面粉厂借到一台“兰克夏”锅炉，又借善昌新染织厂蒸汽引擎一部、发电机一台。同时，向汉口煤气制造公司宝鸡经理处买到集成式木炭炉二部、旧汽车引擎二部，每部为25匹马力，以木炭炉与引擎相连，挂上皮带开火，运转后带动纺纱机。

8月建成纺纱第一工场，9日一台细纱机开始出纱。共安装纱锭6000枚，采用蒸汽木炭和旧汽车发动机作为动力，年底开出1648锭。然而，动力问题始终困扰生产。1940年，从陕西省农本局棉业改进所借到一部木炭机，又买到一台75匹马力蒸汽机和锅炉，并搜寻到旧汽车头引擎大大小小12台，依靠电机工程师龚一鸥和技工陈阿狗等人的慢慢摸索，逐渐解决了动力问题。

窑洞工场防日军轰炸

战争时期，如何躲避日军的空中突袭，是企业必须考虑的关键事项。最初建厂时，李国伟得知西安大华纱厂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纱机几乎全被炸毁。1939年秋，日军进占山西，不断炮轰潼关，威胁陕西。厂房怎么建，发电机设备如何掩藏才能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成为内迁后碰到的首要棘手问题。

按电机房与锅炉房的高度，窑洞无法安装，但地面厂房目标太大，一旦被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设计图纸不断修改，最终决定建窑洞工场。

窑洞工场共有窑洞24个，全长5885英尺，相当于3华里半的路程。长度在200英尺以上的有7个，最长的为360英尺，由6条横洞穿行联通。窑洞的宽度一般在7—16英尺之间，最宽的达18英尺。

窑洞工程历时一年两个月，耗资113万元，挖土方86万立方英尺，砌砖31万立方英尺，于1941年2月28日全部竣工。4月19日，窑洞工场正式开始运转，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

窑洞工场的面积为5.2万平方英尺，容积55.4万立方英尺，安装全套机器和细



申新四厂宝鸡分厂窑洞一角

纱机1.2万锭，占纺部设备的70%。地面车间的机器陆续拆下安装到窑洞内，工人由1100多人增加到2500人。特别是原动部发电机正式发电，为全部开车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对于无法安装在窑洞的发电机和锅炉，经荣德生建议，在平地上盖一座具有窑洞功能的堡垒式建筑，把锅炉房墙壁和屋顶的厚度加大到通常建筑的3倍以上，在屋顶上堆积黄土10数尺形同小山丘，敌机在上空不容易发现。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更艰苦的阶段。日寇飞机对宝鸡的侵袭愈加频繁，几乎是除了阴雨天每天都来袭扰，轰炸达30余次。但是，申新四厂坚持生产，不仅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是带动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厚一笔。

刘磊，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茅盾”笔名取自武汉革命经历

◇ 侯红志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即为正式党员。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革命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不是“沈雁冰”，而是他的笔名“茅盾”。“茅盾”取自他1927年在武汉的革命经历，那么是什么让他“茅盾”？

从“矛盾”到“茅盾”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

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这草头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撤离武汉，隐居上海开始创作生涯，第一次使用“矛盾”笔名写处女作《幻灭》。当时《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见到“矛盾”后，建议加上草头“茅”，他在《叶圣陶序跋集》中写道：“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写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这是我的意思。”

茅盾在上文中，将1927年上半年在武汉的经历，归结为“矛盾”笔名的动因。武汉的这段经历，给了他哪些“矛盾”的际遇呢？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总主笔

1925年11月，中共中央指令共产党员沈雁冰、恽代英筹备组织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任宣传部长。1926年1月，他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央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不到任，由代理部长毛泽东主持工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外事部长分别为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彭泽民担任。中央党部职员中，还有大量共产党员如杨匏安、澎湃、邓颖超等。

1926年3月底，沈雁冰回到上海，全身心从事政治工作，代理国民党上海交通局局长。1927年1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携夫人抵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4月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至7月。

《汉口民国日报》于1926年11月20日正式创刊，馆址设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该报隶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言论机关。沈雁冰在回忆文章《关于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中说，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直接受我们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

《汉口民国日报》的社长是董必武、经理为毛泽民（总管报社事务及印刷发行），历任总主笔苑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编辑部石信嘉、孙际旦、宋云彬、马哲民（马念一）、李达可、倪文海等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办报方针及斗争策略直接受中共中央



茅盾与夫人在武汉

在汉主持工作的瞿秋白指导。瞿秋白曾向茅盾指示，《汉口民国日报》的宣传内容、编辑方针着重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所以，该报实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中型日报。

《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内容不仅涉及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工、商、学等各界，还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福州及国外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聘有特约通讯员，全面、忠实反映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各方面的情况，成为武汉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发行量从创刊时每日4000份，增加到最高时的10000余份，还供不应求。

《汉口民国日报》十分重视言论，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有时一天两篇，还有以个人名义写的“来论”“代论”。这些社（评）论善于抓住当时发生的大事件或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例如在公开

悼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追悼北京遇难的李大钊、北伐战争中牺牲的蒋先云，隆重纪念孙中山、廖仲恺逝世周年等活动时发表的社论、专论等文章，深受民众欢迎。沈雁冰回忆说：“我任主笔时，所有要发的稿件我都要看，社论很短，多是我写的。”

在“矛盾”中坚持真理

《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主要由中共中央确定。然而，由于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经费由国民政府提供，因而受其监督与制约。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汪精卫随后也开始叛离革命，逐步加强对《汉口民国日报》的压力，而这正是沈雁冰接任总主笔的时期。他一方面要宣传党的方针，一方面又要应付国民党的干涉，处境十分困难，“矛盾”来自方方面面。

1927年4月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为投降主义，受到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坚决抵制。沈雁冰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有警觉的，他回忆说：“在接编《汉口民国日报》之后，当时农运‘过火’之说早已传布，我们也知道党中央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陈独秀的，一种是瞿秋白支持的毛泽东的，而且还听说这两种意见也反映了当时在武汉的国际代表之间的不同态度。”沈雁冰坚定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遇到重大问题时多向瞿秋白请示。

1927年4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汉口，沈雁冰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他找我谈话，说《汉口民国日报》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太多，以后要少登。我就向董老（董必武）请示怎么办，董老很坚定地说‘不要理他，

继续登。’董老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旗帜鲜明的。”

关于农村革命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早已有之，但到1927年夏天，党内外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幼稚”“糟得很”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其借口就是农运“过火”。陈独秀也认为许克祥叛变“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沈雁冰则理直气壮地为革命农民辩护：“现在众口同声称为十分‘幼稚’的湖南农民运动原来虽有三分幼稚，犹有七分好处！”

毛泽东曾经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北伐战争中，中共在农民问题上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1927年4至6月异常剧烈。报馆天天收到各地反动势力骚动和农协反击的消息，为了使人们明了农村阶级斗争的真相，报纸开辟了《农工消息——光明与黑暗之斗争》专栏。如4月22日便有《松滋捉拿土豪劣绅，没收财产，枪决反动派》《南漳劣绅组织伪党



1927年3月，茅盾在武汉

部被捕》等7篇消息报道；到了6月，则大量报道反革命派对革命的摧残，如：《宜都县党员之浩劫》《钟祥避难同志为钟祥惨案呼援》《危机四伏的黄安》《罗田惨案请愿团之呼吁》等，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沈雁冰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宣扬农村大革命，揭露汪精卫压制农村革命，必然引起他们的仇视。1927年4月中旬以后，汪精卫下达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沈雁冰既坚持革命原则，又注意策略，经常利用发表社论的机会，以解释“训令”为名，宣传中共的正确方针。汪精卫签署的命令分明是攻击农运过火，沈雁冰“宣传”这些“训令”时，却强调“农运在湖南极为发展，已为大家所共知，农民在乡村中扫除封建势力，建立起革命的秩序，能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他们惩治土豪劣绅，原也用了些非常的革命手段，此亦为暴风雨时代必然的现象，也可以说非此则不能铲除乡村的封建势力”。

武汉“七一五”事变后，董必武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社长职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迫退出，汪精卫先后派杨绵仲、曾集熙接管报纸，改组编辑部，使其成为反共、反革命的喉舌。

沈雁冰受到南京政府通缉，奉党的命令撤离武汉。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七一五’前几天，我就离开了报社隐蔽于汉口。7月下旬我离开汉口时，组织上要我到九江找一个地方接头请示新任务。一到九江，恰恰就是董老（董必武）在那里接关系。董老说现在形势紧张，要我去南昌，如果庐山这条路线不能走，就到上海去。第二天，庐山这条路线确如董老预料，不能走了。同时我又在庐山的一个旅馆生了病！直到8月下旬离开九江回上海。”



《汉口民国日报》旧址

沈雁冰潜伏于上海东横浜路景云里，创作处女作《幻灭》。此后他以敏锐的眼光，概括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用笔名“茅盾”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的辙印。

参考文献：

- [1] 沈雁冰：《关于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史料专辑》，1987年第4辑。
- [2] 唐惠虎、朱英：《武汉近代新闻史·下卷》，武汉出版社，2012年。
- [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 [4] 徐义君：《沈雁冰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期间的思想述评》，《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

侯红志，原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湖北“革大”第一期学员杨玉麟

◇ 杨树德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湖北面临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稳定秩序、恢复经济等繁重任务，而各方面的干部异常稀缺。同时，一批知识青年、旧公教人员也有追求进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因此，湖北省委决定创办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培养学校——湖北人民革命大学，采取短期速成的方式，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以应急需。

杨玉麟（1921—1995），原名杨家溥，湖北随县杨家湾人（今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杨家湾）。1939年加入应城抗日自卫总队，1940年入党，1941年编入新四军第五师三十七团，1942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学习。先后任随南县军政联合办事处和平乡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五师三十七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中共随南县阁河区委书记，五师第二军分区白兆山医院政治协理员、独立团第六团随南支队政委等职。在1946



年6月五师突围前的精简中，杨玉麟服从组织安排，复原回乡从事地下组织工作。武汉解放后，响应号召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李先念兼任校长

“革大”创办于1949年6月，6月25日在《长江日报》登出招生广告，7月考试，8月1日开学。同时，将原江汉解放区开办

的江汉公学、原鄂豫解放区开办的鄂豫公学并入。1950年12月底，又将湖北财经干部学校并入。

“革大”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兼校长，省委农民部部长程坦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王均予任校党委副书记、教育长。李先念多次主持省委会议讨论“革大”工作，经常对学校重大问题作出指示，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干部、学员作报告。在汉中央委员郑位三，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潘梓年，省委、省政府刘建勋、刘子厚、袁振、王任重等领导，对“革大”办学也很关心支持。

1953年5月，“革大”完成培训大批基层干部的任务而停办，历时近四年，前后四期共培养15615名毕业生。

“革大”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地，对当时战乱初定下的各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无论是参加解放全中国的后续战争或支援前线，还是建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无论是参加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还是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绝大多数学员都能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激情、坚定的人民立场，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弘扬了“抗大”“革大”的光荣传统，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湖北“革大”本部

从战士到学员

“革大”第一期学员是在武汉刚刚解放，社会秩序尚不安定的形势下招收的。1949年6月，招生广告刊登后，5000余人应考，7月初分批考试后录取3600多人（其中包括省教育厅保送的原国立师范学校、省一和省二女师、武昌师范、汉阳简师等校的应届毕业生），学校提供膳宿和讲义，其他自备。

杨玉麟作为一名在鄂豫边区成长起来的战士，经过笔试、口试以及严格的政治审核顺利入学，成为“第一期学员”。这一期学员被分成三部，他编入第三部第二大队。

8月21日，“革大”武昌校区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省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及程坦、王均予出席并讲话。为了将知识青年迅速转变成为革命干部，“革大”在借鉴“抗大”等老解放区干部学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学员实施理论思想教育、劳动锻炼和组织生活锻炼“三位一体”的教育。

杨玉麟和同学们一起，每天一大早起床列队、跑操、唱歌，认真听课，积极劳动，课余和晚上还要学习总结、交流发言，整个学习生活热烈而紧张。大家一同经历了预备教育（半个多月）、正式教育（四个月）、总结鉴定（半个多月）三个教学阶段，度过了6个月的快乐时光。

在此期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杨玉麟写了一首诗

《送去迎来》献给“革大”。这首诗既是他多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昂扬斗志与无限憧憬，以此启发年轻的同学们进一步认识旧社会、珍惜新生活。

攻克理论高地

被战火淬炼过的杨玉麟，格外珍视在“革大”的学习。每当晨曦映亮木窗，总能看到他坐在教室角落，就着搪瓷缸里的苦茶啃窝头。泛黄的《联共（布）党史》书页间夹着自制的草纸书签，铅笔批注如弹道般密布空白——这个曾在鄂豫边区冒着炮火斗争的战士，以攻占敌人碉堡的狠劲攻克理论高地。

“子弹打碎旧世界，笔墨铸就新山河”。杨玉麟那本泛黄的红皮笔记本，早已被摩挲得边角起毛。内页分门别类摘录领导讲话和理论文章，不同颜色的标记交织如作战地图：红笔勾画《李先念同志在干校开学典礼上的报告》中的“过三关论”；蓝笔批注《四一二大屠杀》史实与当下阶级斗争的内在关联；铅笔在《婚姻问答》旁写道：“封建婚姻是裹脚布，新婚姻法当如解放鞋。”

课堂讨论时，杨玉麟积极参与，发言带着战场归来的硝烟气。有次辩论“如何对待思想落后群众”，他“啪”的将笔记本拍在条凳上，指着《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引进细菌战》的剪报说：“敌人用毒菌腐蚀肉体，我们若对错误思想留情，就是放任精神瘟疫！”旋即翻到自创的“批评三式”：用“算账法”对照《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揭穿富农谎报产量；以“对比法”结合《五卅惨案补正》，唤醒佃农阶级意识；拿“激将法”引《五四青年节》社论，鼓舞畏缩不前的干部。学员们惊讶之时，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笑道：“这可是从打穿插战术里悟出来的！”

这股带着火药味的理论学习风暴，催生了“行军壶里装墨水，枪杆旁边擦书本”的奇景。食堂排队时，常见学员们传阅杨玉麟标注的《对苏联友谊应有认识》的要点；劳动休息间隙，三五个青年围着他学习“符号记忆法”——△代表待验证观点，△警示教条主义倾向；就连熄灯后的宿舍里，也有悄悄点燃蜡烛誊抄《怎样记笔记》的沙声。

当《怎样记笔记》这篇凝结实战经验的文章登上《长江日报》1950年1月16日“社会服务”栏目时，教务主任特意在全校大会上举起报纸：“看看！杨玉麟同志把战壕笔记搬到了理论战线，这样的‘武器’咱们每人要配发一挺！”有学员说，他的笔记本是“活的马列主义学习字典”，他的发言是“带着硝烟味的理论炮弹”。

在杨玉麟带动下，二大队的同学们掀起了一股学习政治理论课的热潮，他们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国内外局势进行热烈探讨，大大激发了理论学习的积极性。



《长江日报》发表的《怎样记笔记》(局部)

难忘的毕业典礼

1949年12月29日，冬日的晨雾尚未散尽，武昌解放路校舍的青石板路上，已响起纷沓的脚步声。影剧院朱漆大门前，“革大”一期三部的1000余名学员挺立如松，胸前的校徽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九时整，身着灰布军装的李先念校长阔步迈上主席台。“同志们！”他操着浓重的黄安口音道：“今天这个典礼，你们叫毕业，我却说是开学——”台下杨玉麟的钢笔尖在笔记本上重重一顿，洒开一团墨迹。

“那是个新的革命大学，学期长的要五六十年！”他语重心长地说：“眼下头一关就是土改。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不是叫你抡大刀片子，而是要像绣花似的，把封建毒瘤一针一线剃干净！”

李先念接着讲：“我听说极少数同学不服从分配，不愿到艰苦的山区、农村去，不愿离开武汉。我们有言在先：来去自由。这是可以的。你们从水上坐船走可以；从陆地上坐车走可以；有条件从空中坐飞机走也可以，我也欢送你们。但作为校长，我必须告诫你们，你们可要三思而后行啦！将来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会问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参加革命，你们将怎样回答呢？”此刻满场寂静。

最后，李先念说道：“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一代，祖先留下的遗产太贫乏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需要我们来医治，要替下一代创造一个幸福的乐园，树立一个正派的作风。要扫除歪风，克服邪气，提倡正气。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到社会上去，转变社会风气，三年以后就可以看出同志们的力量了。同志们都是茅

山修道的张天师，今天要大家下山去降妖捉怪，希望大家努力。”语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时的杨玉麟思绪良多。童年的苦难，土匪和国民党拉壮丁，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应城日军的残暴劫掠，潮水般涌上心头……他经过战争的洗礼，更深切地懂得和平来之不易，而建设国家是当前重要任务。他来自于农村，更愿意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挥洒到广袤的农村，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临近分配，杨玉麟上交了一封“决心书”：“我是一名老战士，战火的洗礼让我获得了新生。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我的知识和技能是母校培养的，我坚决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报答党和母校的恩德！”

1950年元旦这天，大家唱歌、跳舞、扭秧歌，尽情欢乐。三部流传着一首学员们自编自唱的歌——《革大同学下乡去》。杨玉麟分配至宜昌市公安局，他带着校长的殷殷嘱托，带着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使命，搭上去宜昌的江轮。当江轮拉响第三声汽笛时，他摸了摸怀中油布包裹的《土改工作手册》，封皮上凝结的露水润湿了指纹。这艘开往宜昌的轮船逆流而上，载着他驶向更加广阔的“社会革命大课堂”。

后来，杨玉麟因母亲病重而返回随州，当了小学教师和校长，毕生从事教育工作。

杨树德，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高级小学退休人员，高级工

张之洞的玉石字画逸闻

◇ 方 宏

武昌造船厂拆迁发现清代湖广总督府遗址，考古探究正在进行，笔者也通过查阅文献挖掘相关历史文化。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18年，留下一些有关玉石字画的逸闻，反映了他人生的一个侧面。



湖广总督张之洞

德龄公主笔下的幕府璞玉

晚清德龄公主所著《御香缥缈录》一书，描述她幼年在武昌的生活经历，涉及张之洞对玉石的不同爱好。

德龄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出生于武昌，后在荆州、沙市度过青少年时代，其父裕庚为清朝贵族、外交官，当时受张之洞委派主持沙市的厘税榷关，兼办洋务、教案。

德玲晚年去了美国，《御香缥缈录》用英文写作，中文版根据《申报》1936年版本排版。德玲回忆道：“说起张之洞，大概没有一个读者不知道他的大名吧？其时他正在两湖总督的任上。我们那时的家就在沙市，离湖北的省会武昌很近，彼此本来就有相当的往还，后来我父亲又受了圣上的命，接任为湖北省的藩台（布政使），因此我们全家的人齐跟着父亲迁居到了武昌。于

是我父亲和张之洞便成了很密切的僚友，再加两家的住所又相去不远，所以大家就走动得格外热闹了。而我们姊妹两个，也许是因为他家也有几位年轻的姑娘的缘故，不由来去得分外殷勤，我差不多是三头两日要在他家的，这样我自然就认识了这位有名的政治家，而且还知道他有一个欢喜收藏各种书画古玩嗜好，尤其是各种的璞玉。”

在德玲眼中，张之洞搜集的是璞玉，“很少是已经人工雕凿过的器皿或饰物，而是整块或大条的未经磨制的玉料，也并不立即用它来做什么器物，赏给太太、姨太太及小姐。他只是将粗玉裁成较小的几截或几块，盛在装潢得非常精美的锦匣里镶上玻璃，以便想到它们的时候取出来赏鉴赏鉴。”

德玲说她“那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所以尽可不必避人，径进他书房里去乱跑，往往见有一块长阔各约一英尺，厚约七英寸的粗玉，经那些玉工们再三的磨琢，最后便只剩了二三英寸见方的一小块，厚是只剩一寸左右了，其余的都作为不能用的弃材了，那留下的一小块，可真是价值极巨的拱壁了！不但是玉色匀净，而且连一丝一粒的斑点也没有，所谓‘美玉无瑕’，真堪用来赞美张之洞所藏的那些玉料。”

当德玲后来在宫中，“听李莲英说张之洞差官贲了什么贡品来，便暗暗猜定它们必然是几件玉器。玉器可说是张之洞所独有的种珍宝，他不但收藏着那么许多可贵的玉料，而且在他家里，还养着几个高手的玉工，终年侍候着他，只要他偶然想到要把那一块玉料做成什么东西，便总能依着他的理想做到”。

在宫中，德玲亲见张之洞向慈禧太后所献的玉器，它由李莲英亲自走出去端到太后的面前。那是一具装潢非常讲究的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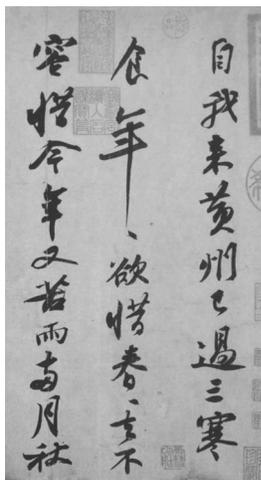
匣，里面又盛着三具花色相同的小玻璃盒，显然是特地做的一套。

德玲细致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和自己的感受：“太后因嫌隔着玻璃盖不能瞧得十分清楚，便教我上前去将那大匣子先打开了，再把小匣子依次捧出来细看。第一具小匣子里是盛着一对玉制的耳环。这一对耳环的玉色是如此的匀净而光洁，竟使我从此厌弃了我自己所有的几件玉器；不但是我那区区的几件玉器万万比不上它们，便是太后往日所款下的许多玉环、玉制、玉春之类，不仅它数量怎样的多，但要有一件能像这一对玉环般的毫无斑点，包泽华美，却委实不能！当太后在细细赏鉴这一副玉环的时候，伊自己脸上的颜色和神情，也很明显地表示着这种意思。这一副耳环的原料，必然是一块最纯粹、最美丽的翡翠，绿得真象一片最鲜明的菩提树叶一样。太后便很小心地把它们拣了起来，举向对光的一面去，迎着光，再加一番仔细的透视，这一透视之下，伊不由越发的欢喜了。回头来向我们说道：‘瞧啊！这是多么的美丽啊！你们可曾瞧见过有比这个更精纯的翡翠吗？无论你们怎样的仔细检视，不用想找出一些斑点来！要找这样一块罕有的翡翠，可真不是一件易事！’”

幕府文人圈的共同雅好

2024年10月，“张之洞与晚清学人书法特展”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展出张之洞、盛宣怀、梁启超、梁鼎芬、康有为、黄牧甫、杨守敬、辜鸿铭等人的手札、对联、书帖、手卷等。

当年，张之洞的幕府，形成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广金石书画学人圈。早在同治年间，张之洞就活跃在京师学人圈中，金石考据和书



《黄州寒食诗帖》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鉴藏已构成其基本的学术路数，金石考据方面的文字被后人集成《广雅堂论金石札》。

在晚清两湖金石书画的学术交往，多借雅集酒会题跋鉴藏等活动进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京师有人携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真迹谒张之洞，他叹为平生所见苏书第一，宴召端方、梁鼎芬、马贞榆、罗振玉一同赏之。罗振玉后来为该帖真迹写得跋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次赏鉴活动。

1899年4月28日，德国海因里希亲王乘坐“格菲欧”号巡洋舰抵达汉口，次日乘坐小汽艇抵武昌织布局码头，张之洞登船迎接，并在总督衙门与其会谈约两个小时。右上悬挂的是《李曾伯纪功铭》拓片，可见张之洞的喜好。



《李曾伯纪功铭》摩崖石刻，刻于襄阳城西南1.5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石壁，是为纪念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京湖制置使李曾伯抗击蒙古军队取得光辉战绩。

张之洞“书生习气”终其一生，为展现其文人学者风采，常常为各局、厂、书院、学堂、著名建筑和景点题写佳句，湖北织布



张之洞题写的“布衣兴国，蓝缕开疆”

局、两湖书院、武昌奥略楼、汉阳晴川阁、黄州东坡赤壁等都题写有楹联。给织布局题写“布衣兴国，蓝缕开疆”的楹联，给奥略楼题写有“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张之洞常将自撰的对联赠给幕僚，时人回忆说：“之洞的馆阁体大字写得极好，在鄂时对僚属多半送过对联，任各县教谕者必每人得其一联。胡治熙在《琐谈张之洞》《张之洞遗事》中谈到，赠送诗书、对联、字画，是张之洞联络幕僚感情的重要方式，也给幕府增添了些许人文色彩。

方宏，民建江岸区会员，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辑，参与编写《球场街志》和《荣华街志》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合影名单考

◇ 田联申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7年3月10日，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二届三中全会），30位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委员）参会，留下“开会纪念日”合影，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士济济一堂。

1927年2—3月，国民党二届中执委常委会的会议，通常下午4—5时在南洋大楼3楼召开，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载有2月22日至3月1日的4次会议记录，参会人数最多的是22日的第75次会议，计28人出席，研究决定重要事项，实为工作会议。3月10—15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30人出席，合影应是当日下午开会前在顶层平台花园拍摄。

笔者发现，如此重要的与武汉城市历史密切相关的老照片、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在武汉的合影，居然没有一份完整的说明。本文抛砖引玉，试作解析。

这次合影有两个版本：一为“武汉博物馆提供”并附有说明的29人照，不常见；一为汉口南洋大楼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展陈的30人照，通常看到。

武汉博物馆照片的说明，29人只有22人的名字，空缺7人：第一排右起：吴玉章、甘乃光、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孙科、





谭延闿、徐谦、（9缺）、丁惟汾，第二排右起：彭泽民、林祖涵、毛泽东、顾孟余、（5缺）、（6缺）、（7缺）、（8缺）、董必武（注：照片中少一人），第三排右起：许伯昊、瞿秋白、邓演达、恽代英、陈公博、詹大悲、夏曦、（8缺）、（9缺）、苏兆征。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照片说明，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代表合影 国共两党许多著名人物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征、宋庆龄、孙科、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徐谦、宋子文等参加”，30人参会，只有13人的名字，且有一人标错，谭平山当为谭延闿。武汉收藏家朱汉昌收藏有与此相同的照片，附有一张打印的人员名单，空缺1人：第一排左起：丁惟汾、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经亨颐、吴玉章。第二排左起：（缺1）、董必武、丁超五、邓懋修、陈其瑗、于树德、彭泽民、毛泽东、林伯渠、朱霁青，第三排左起：周启刚、王乐平、王法勤、夏曦、詹大悲、陈公博、恽代英、邓演达、许甦魂、谢晋。

照相馆拍两张照片为业务惯例，如拍登记照一样，两张底片由人任选一张洗印。

29人照中，不少人交头接耳，目光也不集中，且第二排只有9人，大约是先拍的一张。30人照，人到齐了，大家也不交谈了，正襟危坐。以前没有注意到，两张照片中的人数不同。

朱汉昌收藏的照片，是在上海参加拍卖会买回来的，附有与会人员名单，但“二排左起董必武”分明不是董必武，左起第二人才是董必武。再数一下，2排有10人，名单只有9人，缺了

左起第一人，他是谁？

翻开《武汉国民政府史料》，发现中执委常委会4次会议（2月22日、24日、26日、3月1日）名单中，都有一位江浩出席，合影照名单空缺的名字，会不会是他？网上输入“江浩”，很快就找到了，就是他！



江浩（1880—1931） 苏兆征（1885—1929）

江浩，河北玉田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天津后与于方舟、李锡九等人，在天津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任组织部主任。后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参与

领导迎接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5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注：此说存疑，《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61页，徐谦于4月7日任命为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4月10日就职）。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1931年病逝于海参崴。

两个版本的照片名单中，三排左一名字不一样，朱汉昌收藏的30人照为周启刚，武汉博物馆提供的29人照为苏兆征。

《中国人物大全》“周启刚”（作者竺正林）载：1927年3月10日，参加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拍摄了一张全体委员的合照，参加合影者共30人。由于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所以周启刚与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在二届三中全会中的合影照片珍藏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发表于1981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第12期以及《文物天地》《纪念宋庆龄同志》等报刊书籍。

作者言之凿凿，但在《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所载多次会议名单中，没有看到周启刚的名字。

武汉博物馆提供的照片说明为苏兆征。查阅《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有陈部长公博、苏部长兆征、陈部长友仁相关记载，苏兆征排在第二位。网上找不到周启刚的照片，但有苏兆征的照片，经比对当为苏兆征。

除了照片比对，还有二条重要线索。《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97页，周佛海在《逃出赤都武汉》一文中说，三中全会“内中有一个议决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就是他们要

和国民党共握政权，共同组织政府。而这个议决的原因，乃是根据第三国际的议决，因为第三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变更了”，“他们实行这个议决的第一步，就是共产党的谭平山为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工人部长，又以共产党的董用威为湖北农工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张芬为司法厅长”。还有第63页，4月19日“案奉国民政府任命陈友仁、苏兆征、陈公博、何羽道、吴士崇、詹大悲、李国瑄、张国恩、向忠发、郑惠吾、周星堂等为武汉市政府委员”，均可见苏兆征这段时间在武汉活动，且担任重要职务。

30人照名单齐全了，第一排左起：丁惟汾、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经亨颐、吴玉章，第二排左起：江浩、董必武、丁超五、邓懋修、陈其瑗、于树德、彭泽民、毛泽东、林祖涵、朱霁青，第三排左起：苏兆征、王乐平、王法勤、夏曦、詹大悲、陈公博、恽代英、邓演达、许甦魂、谢晋。

合影照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光时刻”，几个月后国共分道扬镳，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其实，3月10日会议当天即发生冲突事件，“湖北武阳夏（注：武昌与阳夏的合称）及汉口特别市各党部为庆祝并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开会，在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毗邻南洋大楼）召集党员大会”，会后在血花世界喊“打倒蒋介石”的湖北工人宣传队，与从武昌赶来参加会议“拥护蒋校长”（此时，蒋介石与部分中执委常委在南昌）的军校学生发生冲突，军校学生人多势众占了上风。

田联申，武汉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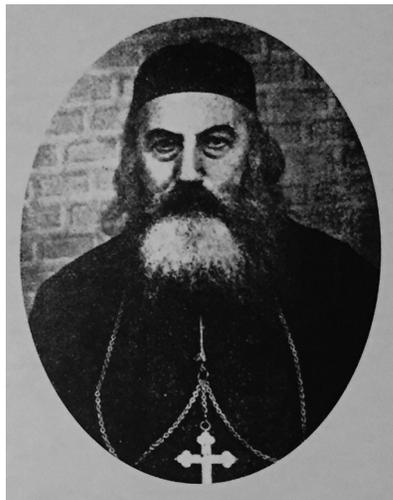
◇ 董玉梅

来武汉的外国传教士，每一个人都学有专长。正因为如此，只经历了两任大主教，花园山就成为天主教的权力中心。大主教留在花园山的足迹，丰富了武汉的宗教史，也在武汉的教育史、医疗卫生史、城市建设史方面留下了丰富内容。

江成德和天主教建筑群

江成德（Epiphanius Carlassare）（1844—1909）任鄂东代牧区主教的时间长达26年，他任职的1883年至1909年，是天主教在武汉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信徒从9900人发展到18016人，几近翻番；天主教堂也不断增建。

作为建筑大师的江成德，光绪十五年（1889）拆除圣家小堂，设计建造了一座罗马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武汉天主教的经典建筑。教堂主体工程于光绪十七年（1891）完工，耗纹银一万两。由于该堂奉耶稣、玛利亚、圣若瑟三圣为主保，故称圣家堂，成



江成德主教像

为原鄂东教区和武昌教区的主教座堂，光绪十八年（1892）12月17日正式开放。

圣家堂的窗户不大，外墙十分厚重，给人坚固沉重之感，因依山而建，要上十多级台阶才能进入大堂。大堂内空极大，长36米，宽18米，高20米，使用面积600余平方米，设有祭台7座，可容1000信徒做弥撒。大堂天花板上的雕花图案贴有纯金箔，灯光闪烁时金碧辉煌。正殿天花园和正前方的半圆



1985年的圣家堂内部

顶上，镶嵌着排列整齐的金色木雕装饰。堂内四周有8幅油画，悬挂9盏彩色水晶灯。圣家堂一度入驻武汉电缆附件厂，油画和水晶灯损毁，1983年10月修复开放。

现堂内北端为圣体主祭坛，上面供奉有耶稣、玛利亚、圣若瑟的巨幅油画像，东翼两祭坛供奉耶稣牧羊图和圣方济各圣迹图，西翼两祭坛供奉圣母升天图与圣安多尼圣迹图，宗教气氛十分浓烈。

至今，圣家堂已有134年的历史了。站在这栋老教堂面前，正面呈对称状，檐饰和正中上方的三角形山花，与主教公署的山花遥相呼应，只是山花顶部树有十字架；两个不大的三角形窗口之间，嵌有“天主堂”匾额；匾额之下的圆形日晷仪是记时仪，上有9个罗马数字，数字之间均有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不同的时间，既有实用功能，也起装饰效果，为典型的欧洲风格。

圣家堂是花园山一带最高的建筑，无论太阳从什么角度升起，都可以完全照在日晷仪之上。人们通过日晷仪影像停留的刻度，可以准确无误的判断时间。这个今天仍然行走的日晷仪，即使在整个中国也极其少见。

日晷仪是古代的计时仪器，又称“日规”。中国早在周朝时，就有日晷的使用，

但如圣家堂的垂直式日晷，则只在英、法、德、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流行。

江成德的另一个建筑作品是文学书院，其“文学”是纪念董文学。光绪七年（1881），董文学殉教40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追封董文学为“真福品”。光绪二十二年（1896），董文学被封“真福品”15周年时，江成德创办“文学书院”。

文学书院选址在花园山天主堂西边，两排校舍为西式三层楼房。书院秉承董文学的传教理念，以义学方式劝募华人子弟入学，借以扩大教会影响，培养华人年轻教徒。学校开有英语、法语打字班，学生毕业后，由书院直接介绍给外商和洋行工作。文学书院即今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原址。

花园山上的嘉诺撒武昌圣堂，也是江成德的杰作。光绪十四年（1888），汉口嘉诺撒仁爱女修会派出几名修女，首次来武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主要为收养孤儿。这是嘉诺撒仁爱女修会进入武昌的准确时间。为了让她们有自己的祈祷场所，江成德设计修建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圣堂，至今仍然在花园山上站立着。



2005年的嘉诺撒武昌圣堂

可到1948年，小教堂就空置了。随着湖北省圣安多尼联合中修院学生人数的增加，小教堂一度改为学生宿舍。如今改造县华林时，小教堂修缮一新。

从圣家堂、文学书院、小教堂等建筑的兴建，可知江成德任职期间，不断扩大教会的影响，更新教堂，创办学校。这些建筑和主教公署一起，在花园山形成了一片高质量的天主教建筑群。他还改造和扩建汉口天主堂医院，又在东西湖兴建柏泉方济各会会院及圣安多尼小修院。这些武汉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大多仍在发挥作用。

宣统元年（1909），江成德在主教公署内去世，安葬于洪山墓地。他的继任者是意大利人田瑞玉（Gratianus Gennaro）主教。

艾原道和武昌监牧区

田瑞玉（1863—1923）是鄂东代牧区最后一任大主教，也是天主教兴旺时期的大主教。他于光绪十八年（1892）4月2日晋铎神父，不久就任柏泉天主堂的主任司铎，兼管男孤儿院和天主教公学，后将公学改为教区预备修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他受江成德的委托，在柏泉修建方济各会初学修院和教区小修院。他也擅长建筑设计，并参与了汉口天主堂附属医院的扩建工程（今武汉市第二医院）。

因田瑞玉的传教重心在汉口，他便不断把花园山的宗教资源调至汉口。因此，从明位笃时期开始的湖北天主教区权力中心，逐渐转向汉口。田瑞玉晚年时，一直居住在汉口圣若瑟堂。他任主教14年，直至1923年12月病逝，安葬于宝丰路新建的教会墓地。时有信徒43914人，中外神父56人，大修生39人。



田瑞玉主教像、艾原道主教像

田瑞玉之后，由原鄂东代牧区经理处经理、美国方济各会会士艾原道（Silvester Esplage）接任负责人。艾原道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抵达武昌的，他是方济各会历史上第一位抵达中国的美国籍会士，来自俄亥俄州圣若翰方济各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艾原道赴鄂城、黄冈、蕲州等地农村传教，宣统二年（1910）调至汉口圣若瑟堂，任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经理处主任，深得田瑞玉主教的信任。1913年返回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返回武昌花园山，创办文学中学。

文学中学这块土地，在郎家巷与花园山路的转角处，占地面积15亩2分，也是明位笃在主教任上购买的。文学中学1921年建成，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食堂、学生宿舍、室内操场等。艾原道任教务总监，聘爱尔兰籍圣母会的几名修士主持校务，请美国神父教授英文，另设语文、史地等课程。此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没有办立案手续，教学内容也不甚完善。1926年又因北伐战争停办一年，1927年复校时聘请教育界名流万人杰任校长，徐楚珩、陈鹤年（注：徐楚珩后任汉口上智中学校长，陈鹤年后任武昌善导女中校长）任教师。由

于师资力量强大，学校很快在武昌有了较高声誉。

教会在花园山也办小学，编写宗教《三字经》，用以吸引中国儿童。有些传教士还把宗教《三字经》带到医院，散发给儿童和家长。可见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也是“从娃娃抓起”。

1922年，艾原道在文学中学旁开办武昌方济各印书馆，出版英文《在华方济各会会士》月刊，向国外宣传传教成果，筹集传教经费。后扩大印刷中外文经书、教会资料及本堂主日刊等，还代汉口意大利传教士和在湖南的西班牙传教士，印刷意、西两种文字的宣传刊物。印书馆主持人除神职人员外，还聘美、英、爱尔兰籍男女教友数人任职。

1937—1938年，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抗战气氛浓烈。艾原道组织方济各印书馆，出版印刷《益华报》《真光杂志》等中文刊物，艾原道为总发行人，由中国神父牛若望、张茂先任编辑，报道战地消息，极力宣传抗日，号召全民誓死保卫国家。印刷机和发电机均从国外进口，中外文印字清晰，还可制版印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

1923年12月12日，为贯彻教会本地化政策，教廷驻华全权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汉口将鄂东代牧区分割，以长江以南六县（原计划为十县，后划出四县成立蒲圻监牧区）建立武昌监牧区，管辖武昌、黄石、鄂城、阳新、咸宁、大冶的教务。1925年7月17日，教廷又委任艾原道为武昌监牧区监牧。

花园山最高处有一个小型天文台，是艾原道时期修建的。因此，有人说艾原道是天文学家，其实不是。1926年10月，热爱天文的神父、美国人蒲日济（Conradin Burtschy）来到武昌，时年27岁。他在花园

山天主堂学中文时，建议艾原道在花园山最高处建一座天文台，用来观测天象。艾原道便让他负责修建，1930年完成。

这个天文台是武汉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天文台，载入《中国天文志》，在中国气象史留下了重要一页。天文台内的望远镜，可以观察日月食、星球运转和预测气候，但操作者只有蒲日济一人。几年后，蒲日济调到黄石传教，天文台就搁置了。由于天文台是花园山上最高建筑，加之台顶有部分是平台，教会人士常在晚间登临观赏风景。



1935年的武昌花园山天文台

武汉沦陷后，天文台内的望远镜等仪器设备，被日军掠夺一空，主体建筑尚存。1990年代初，中南神哲学院扩建教学楼，建筑工人搭施工脚手架时，将紧邻新建筑的天文台拆毁一半，被武汉科技界认为是一个重大损失。

1927年，艾原道还在圣家堂创立圣约瑟诊所，聘请美籍德国女士何德美（Mary Hubrich）主持诊所，采取免费医治，送医上门的方式对待病人。不久，诊所迁至原嘉诺撒仁爱女修会会院，发展成为圣约瑟医

院，即今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何德美是艾原道指定的花园山育婴堂的管理者，因为她是美籍的缘故，美国爱德会的修女也在此时来到武汉。“圣约瑟”是天主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俄亥俄州有一座圣约瑟山。1928年2月号的教会刊物《方济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贞石港已经有了一个卢森堡，不久，我们就在扬子江畔有一座圣约瑟山。”这个扬子江畔的圣约瑟山，就是指艾原道主持之后的花园山。

1928年9月，艾原道在武昌大堤口圣多默天主堂附近，建有圣罗撒女子小学和圣罗撒诊所。1929年，又增设附属天主教成德小学，以纪念江成德。1929年10月，协助美国主母会建立天主教善导女子中学。在艾原道的主持下，武昌监牧区继续扩张，终于形成以花园山圣家堂为中心，从大堤口的圣多默堂到粮道街，包括教堂、育婴堂、医院、印刷馆、学校、救济院等在内的天主教建筑群。

1930年，艾原道特别忙碌。5月30日，天主教武昌监牧区升格为武昌代牧区；6月2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电谕刚恒毅总主教，特任艾原道为武昌代牧区宗座代牧；7月7日，根据传教区体制，教宗授予艾元道主教职务，领銜Oreus城（古希腊城市，位于今马其顿）主教。根据辛辛那提会的会长建议，特命艾原道前往美国接受祝圣，8月初前往美国，9月7日抵达辛辛那提，在城外方济各会的初学修院避静。

1931年8月武汉大水，汉口市区被淹，大批难民到武昌蛇山避难，艾原道下令教区所属修女为难民送诊施药。1938年武汉沦陷后，艾原道将文学中学辟为难民收容所，收留过往和本地难民3000多人。不仅如此，



武汉沦陷时文学中学收留难民

艾原道还联合基督教圣公会等组建武昌救济院，把印书馆也辟为避难所，接收社会慈善机构敬节堂、广仁堂、乞丐所的人员在此避难；又组建妇女习艺所，让妇女织袜织毛巾，直到1942年。后来，印书馆逐渐成了居民住房，1992年教会将原有房屋拆除，在原址上修建了一栋8层楼的居民住房。

1940年10月25日，艾原道病逝于武昌圣若瑟医院，安葬于武昌小龟山教区墓地。此时的武昌教区，已拥有6座正规教堂、53座小教堂，教友11000多名。

1947年，梵蒂冈驻国民政府公使黎培理主教（Antonius Riberi）决定恢复文学中学，以培养神职人员。1948年9月文学中学复校，新成立的湖北省圣安多尼联合中修院学生，在此就读并住宿在校内，同时也招收教外的学生就读。195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接收文学中学，教师与学生合并到其他中学，校舍转给华中师范学院办印刷厂，后改为职工住房。1954年夏秋，武昌教区代理主教蒋苏在武昌安东尼中修院修士的帮助下，将艾原道主教的遗骸迁移，埋葬于武昌教区主教公署。

董玉梅，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归元禅寺翠微古池

◇ 韩少斌

据民国《新辑汉阳识略》记载，“归元寺，在西二里。清顺治初，僧白光即王章甫葵园故址建”。《归元禅寺志》说：“园距汉阳古城二里，前有大塘，月湖港送水，再奔夹河而长江。至于园中翠微峰，乃挖翠微池出土堆成的假山。”

关于葵园，《续汉口丛谈》道“园中亦有奇石，绉透殊伦，题曰翠微峰，峰旁有井，号翠微井”。另有传归元寺碑记关于葵园的描述，如“风动葵园，葵本无目，向日而繁。蕉本无耳，闻雷而荪，无根树子，盖世如云……”。



老照片中的藏经阁前翠微古池

据此有关史料，归元禅寺的寺址原是一处私家园林——王氏葵园，藏经阁前的翠微古池就是葵园的观鱼池，水源来自地下泉水和天上雨水。相传无论酷暑严冬，古池的水位都不改变，从未出现枯竭或者泛滥的现

象。归元寺翠微妙境之“妙”，与其中的翠微古井、翠微古池有很大关系。这口井，这方池，自古有之。历经数百年，井水终年不断，池水经年不竭，真是妙不可言。

关于翠微古池，《归元禅寺志》记述也较为详细，它提到此池在山林之中，池水清幽，故得翠微雅名。相传为明人所开，凤山水为其注，月湖港为其漏，有来有去是谓活池，放生灵龟，延年益寿。

1950年代，弥宝方丈在池南北添设翠微亭两座，作为翠微茶社用亭。亭阁楼台拥于翠微之中，古泉古池伏于丛香之下，五色映辉，蜂蝶翻飞，是谓妙绝。俯视古池，危楼摇摇，携金鱼游弋；云花朵朵，偕瑞莲怒放。经阁云天，犹临仙境。凝眸古泉，但见井天有“翠微古泉”的隶书，惊首仰视，乃亭顶四字映之。

昌明方丈中兴归元时，翠微亭因有碍人流早已拆掉，只修翠微池。抽水清淤，铺石为底，垒石为墙，使活水更活。放养浮萍，放养水草，使绿水更绿。活与绿，乃翠微古意之灵魂。相传古池围栏之石作，在咸丰兵燹后的重建中，移到中院放生池做了石栏，而古池将将就就，或木栏，或竹栏，直到大修前所见之栏则为砬栏。此次大修，财力充足，中院放生池石栏做了新的，将旧的还给了翠微古池，真乃物归原主了。

大修后，翠微古池为正方形，面积约122平方米。

葵园的主人是明代汉阳人氏，名王衿，字章圃，据同治《续辑汉阳县志》记载，王章圃“少英异，从萧良有、郭正域学，为诗文”。《新辑汉阳识略》云“工诗，清丽有晚唐风”“辟葵园于郭西，雅集名流，文酒游宴。袁中郎昆仲客武汉，频主其家。后以贡官华州牧，升成都府丞，吏治亦卓卓可传。”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归元寺路经翠微古池

王章圃与明代著名“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以及李贽、谢三秀、潘之恒等名士有密切来往。为了能与文人墨客一起赋文论诗，《续汉口丛谈》称王章圃“于明季擅园林之胜者”“辟葵园于汉阳城西关二里，招致雅流，如袁公安、麻城邱长孺辈，觞咏其中”。《新辑汉阳识略》又云：“王氏园林：明王章甫郡丞衿尝构水明楼于凤山脊，袁中郎宏道有诗咏之，又有《元日坐水明楼》二首。王氏当时复辟葵园于城西关外二里，招致雅流如袁公安、麻城丘长孺辈觞咏其中。公安昆季道武阳时至其家，公安有《过汉阳王章甫葵园和二仲韵》诗。”诗曰：“户外即遥岭，寒香渐出林。增池缘亩阔，疏竹为庭阴。烟雪裁为句，风泉写入琴。欲知桐性老，火里试焦音。”其中“增池缘亩阔，疏竹为庭阴”就描绘的翠微古池及葵园景致。其实袁宏道还有《早春过葵园次苏潜夫壁间韵余往过此八年矣》也是有关葵园的，



2015年，翠微古池填没前后

“高斋只在郭门间，世外佳人共往还。老去心情浑念水，重来竹树已连山。幽花近暖争先发，好鸟逢春尽不闲。别后新功何所验，临溪且照旧容颜。”好一派早春翠微景色，及对葵园水的思念和平静生活的向往。

袁宏道是明代著名文学家，荆州公安人，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声势尤为浩大。

相传在王章圃之后，葵园传给了其子王紫函、王紫宿、王松生兄弟，后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卖给了张恭存。一年之后，孙耀先、戴天成等居士“偶道及楚地”，有意为正在汉阳兴国寺研读藏经的白光、主峰和尚捐资创立梵宇，以嘉其“操志艰苦”。孙等人“卜得汉阳凤山门外王氏葵园”可建梵刹，于是他们与张恭存商议，以原价购得葵园，并约定“基址、田地、房屋自卖之后，顺从孙、戴等舍作丛林，改庵建塔”，让“白光兴造丛林”。

2016年，有市民发现，翠微古池已填

为平地，石栏也不见下落，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引起社会人士关注，但恢复问题仍未见进展。明代汉阳名士王章圃开辟的葵园，翠微峰、翠微井、翠微古池三位一体，时称“汉西一境”。归元禅寺在葵园基础上创建，翠微古池是其现存最古老的建筑遗存，甚或可称之为归元禅寺之根，弥足珍贵。

人们期盼翠微古池恢复历史风貌，一是有利于归元翠微文化的升华，将葵园园林元素重新嵌入归元禅意中，体现翠微妙境的自然风光；二是有利于荆楚文化的发掘及发扬，彰显“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文学流派，阐述汉阳一代文风；三是有利于汉阳古城历史风貌区的打造，弥补汉阳古建筑仅有为数不多的清代遗留之不足，体现汉阳古城的历史厚重和传承有序。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

大成路琐记

◇ 陈德刚

大成路是条老路，东西走向，从解放路街口到平湖门江边，全长约 700 米。大成路原名玉带街，1933 年扩建时，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庙在其东北侧，改名为大成路。

步入大成路，首先看到的是大成路菜场。认识大成路菜场，要感谢八爷爷，在菜场门口跟八爷爷一起买过鸡娃。农村人挑着圆筐子，小鸡娃一块钱 5 只，哨子一吹，碎米一撒，小鸡娃都活蹦乱跳起来。八爷爷告诉我，倒提着脚，公鸡头往上，母鸡头下垂，从此我养鸡 10 年直到 15 岁。养鸡人说，黑一千，麻一万，只有白鸡不下蛋。这个说法很准，我养的鸡，麻婆母鸡可以连下 8 天蛋。此外，一只黑毛双冠公鸡威风凛凛，全身无一根杂毛，打架总得冠军，借取路名叫了“成成”。

大成路菜场时常进去买菜，青菜几分钱一斤，卖到最后几分钱一大堆。肉、排骨和板油最难买，有时计划票都放过期了。为了买这些紧俏货，用烧箕、砖头站早队和夜

队，我都试过。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我起了个大早床，好不容易买到一铤子脊骨，虽说没排骨好吃，已引得众多邻居羡慕。美中不足是小偷趁家中开门早，把晒在堂屋的衣服都偷了。菜场每天早晨六点开秤，开秤前已“人满为患”，起晚了想再站队买到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菜场对面是老马开的热干面店，辣得流汗是他家热干面最大的美名，有些吃客为求“辣”，从四面八方来吃“辣”面，干瘦的老马骄傲地笑道：“你莫看买面的队蛮长，都是为辣椒这一口！”

老马店往前走，有一家三轮车分理处，早上总有车夫骑着三轮车，在门前排着队等候派活。江边平湖门花堤街的对街，还有一家板车分理处，早上也有不少板车沿街等候任务。三轮车夫和板车夫身体都好，有力气又有技巧，但板车夫比三轮车夫辛苦很多。所以，板车分理处的职工很多都住在附近，



儿时作者（右）在老街

大成路菜场、省汽修周边及乃园，都有板车夫的家。

老马店的旁边是三个大圆门，牌子上写着“武汉市第十中学”，一条偏街连着顺山而建的黄鹤楼剧场。再往前，也有条一偏街叫黄鹤楼道，围着的是带幼儿园的黄鹤楼小学。

我先上黄鹤楼小学幼儿园中班，蛮喜欢大班一个胖胖的姑娘伢，总把能得5分的蜡笔画塞到她手里，她说过一声谢谢没有，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件事我总记得。我总是“骂”自己，从小就讨姑娘伢的好。

我在黄鹤楼小学上一年级时，第一天在抽屉捡到一包钱。捡到东西要上交，这是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当即举手交给了老师，老师点数有4元之多，当众表扬了我。

1968年进入十中，我们是就近入学的第一批。十中校园从大成路街上漫到引桥蛇山边，操场和楼房各占一半，有四栋教学楼和一座大礼堂。进十中时，大门是高高的院墙，三个门平时都从右门进出，听说只有1965年国家羽毛球队来学校表演，打开过中间的大门。入内过了前面两层楼的教学楼，有一座牌坊（棣星门），还有泮池和状

元桥遗址。穿过两边是厢房的甬道，上了台阶就是大礼堂——过去的大成殿。

十中院墙外是黄鹤楼剧场，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直到引桥边，售票处设在下面。因为电影、戏剧都上演，所以剧场很俏，总是人进人出。剧场阶梯座，观看效果很好，前面的遮不到后面。我常在这里看电影，也常同家里老人在这里看戏。

黄鹤楼剧场建成之前，前面有一家旧影院破破烂烂，前后座全是平层没有视差，前面的可以坐着看，后面的就只能坐在椅子背上了。但《小兵张嘎》《地雷战》，我都是在这个老影院过的瘾。

板车分理处门口，总是站满了大人小伢。我们班上家有板车的同学，不时请假去帮父母拖板车，一点小就为家里排忧解难，风雨磨炼了他们的筋骨，看着看着不由升起一种佩服的感觉。

乃园遗址位于蛇山西端南坡，占地数十亩，园内布局依山势转折而下，形同“乃”字故称乃园。明清两代，乃园是湖北按察使司署的后花园，始建于明洪武年间。

武昌区房地产公司后院墙上，嵌着一块“乃园图记”的石碑，提款为“光绪十二年二月权汤诸可权题”。作者曾任江夏县令，工书法，善绘画。这幅“乃园图记”写实性很强，布局疏朗，视野开阔。从中可见，凿石为泉，临水置亭，青瓦粉墙，板桥竹篱，一派田园风光，给人以亲切自然的美感。后来，这一片改成一些单位的办公处所。

如今，大成路成为武昌有名的美食街，但数十年前的碎片化记忆，也留住了一些烟火气息。

陈德刚，湖北省总工会事业部原部长